

春晚燃爆了黄鹤楼

蛇年蛇山，春晚春潮，黄鹤楼闪耀央视荧屏，向全球亮出“武汉七分钟”。

三镇盛事，天下齐观，黄鹤楼自古号称“天下江山第一楼”，无论时间、空间、人文三维度，都足以担当武汉最具代表性的地标，标领古城历史地位、江城地理形胜、名城文化风韵，一城三叠，千古流芳。

黄鹤楼标领古城起点。公元223年，三国东吴时期，一座军事瞭望楼闪现黄鹤矶头，却是武昌古城1800多年的肇始。由此，从武昌“一城雄踞”，到武昌、汉阳“双城并峙”，再至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黄鹤楼的屡毁屡建，反衬出大武汉的与时俱进。谈笑间，赤壁大战尚未硝烟散尽，武昌首义就已枪声破晓，改朝换代的历史玄机，都在落入荒草的风铃中。当1985年重修归来，天堑一桥飞长虹，龟蛇二山起宏图，“白云黄鹤”与“光谷银河”同框。

黄鹤楼标领江城制高点。一楼高耸，两江交汇，三镇环顾，八面来风，大武汉尽收眼底。楼前牌坊“江山入画”身临其境，乃神来之笔。更有伟人的“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赋予雄阔视野，黄鹤楼承启大江东去，全然是华中天元星位的一颗“金钉”（地理标识）。

黄鹤楼标领历史文化名城基点。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有王勃《滕王阁序》，岳阳楼有范仲淹《岳阳楼记》，黄鹤楼有崔颢《登黄鹤楼》，各自两相辉映，不知谁成就了谁。尤其黄鹤楼，自唐诗滥觞而吟诵不绝，就连“李白搁笔”也成佳话，而“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直接为“江城”美誉和“梅花”市花，奠定了千年之约。

黄鹤楼是历史的馈赠，是时代的造化，它的神奇之处，即由城防设施变身为人文名胜，就像赳赳武夫修炼为翩翩雅士。它那无需霞光映照的金碧辉煌，恰是通体富有“含金量”，萦绕神话传说、历史掌故、名人遗事，披挂诗词歌赋、匾额楹联、雕塑壁画，吸附历代艺术精华，凝聚为城市形象的典型符号，也堪称中华文化的瑰宝。

20年前，央视2005中秋晚会“江城月·中华情”落座黄鹤楼，营造出“大江映名楼，两岸踏歌声”的独特不眠月夜，天涯同一楼，千里共婵娟。20年后，春晚武汉分会场相中黄鹤楼，消息一剧透，利好效应迅速外溢，“跟着春晚游武汉”蹭热，“与春晚同款”爆款。春晚一亮相，黄鹤楼魅力绽放，7天来客24.6万人次，带动“春晚出镜地”转化“网红打卡地”，火了江汉路、黎黄陂路、吉庆街、昙华林、户部巷……城市文化底蕴拉得满满的。

步入2025，黄鹤楼问世1802年，重修落成40年。它之于武汉人，乃是家国情怀所系，亦然集体记忆所依，我们唯有不辜负。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 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 编：阮祥红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刘 玮

编 辑：许 濛 章旷怡

封 面 设 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春晚燃爆了黄鹤楼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1965，武汉版《东方红》唱响江城 / 王 娟

风雨同舟

<<< <

12 谱写一曲新时代履职奏鸣曲 / 徐 莉

九城同心

<<< <

16 寻源武汉话郢国 / 朱绍斌

委员天地

<<< <

22 我在武汉的“黄金十年”

/ 刘 萌（口述） 章旷怡（整理）

26 从田间到高楼：我的潮江记忆 / 宋武汉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 <

29 吧哒科技的破与立

/ 陈立军（口述） 门霁雪 周曼玉（整理）

烽火江城

<<<< <

32 序战失利（上）：安庆与湖口战役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二 / 涂文学

人物述林

<<<< <

38 唐际盛：从黄陂到黄花岗的革命人生 / 彭 澎

42 梁启超 1922 年武汉演讲佚文 / 肖朝晖

47 新发现张难先给李春萱的信 / 罗时汉

扫街探疑

<<<< <

51 中共五大开会地点考 / 田联申

都市寻踪

<<<< <

56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二） / 刘宝森

往事漫忆

<<<< <

60 武汉新区“六湖连通”构建生态水网 / 吴世纬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1965，武汉版《东方红》唱响江城

◇ 王 娟

轮印：1964年国庆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首演，轰动全国。1965年大年初二，武汉版《东方红》在江城亮相，连续公演217场，观众达58万人次，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武汉剧院观看演出，周总理欣然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1964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隆重首演，3500多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加演出。这一巨制，开创了以歌唱、舞蹈和戏剧相结合的综合大型歌舞表演的新形式，以史诗般的宏伟风格和波澜壮阔的艺术画面，生动形

象地展现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表现了英勇顽强的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以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强意志。因此，在全国产生极大反响，海外也为之关注。

时隔4个月，1965年2月3日，大年初二，武汉版《东方红》在武汉剧院拉开序幕，江城随之沸腾。为满足观众要求，《东方红》连演100场，不仅在武汉三镇掀起看《东方红》、学唱《东方红》歌曲的热潮，也吸引了来自湖北省内和全国的观众。之后，《东方红》转场到中山公园人民会场连演3个多月，7000余座位场场满座。

“四方面军”二十天排出

1965年1月11日下午，湖北省召开誓师大会，宣布在武汉排演《东方红》，并组建专项办公室。此前，已派出编导、服装、化妆、舞美等人员前往北京学习，多达数十人。

出生于1940年的何大彬，当年作为武汉歌舞剧院的编导和演员，参与武汉版《东方红》的排练和演出。此前，何大彬已主演湖北省第一部原创舞剧《槐荫记》，因此作为主创编导、演员入选北京学习的行列。他介绍，《东方红》在北京首演后进行了调整，因此武汉学演的版本由序曲和《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六场组成。因时间太紧张，在北京的学习按场次进行了分工，他负责的是一、四、六场。“开

场的序曲《葵花向太阳》和结尾大场景的部分由全体演员完成，中间的场次分开排练。这样的分配也便于演员换装，这个安排是比较科学的。”

何大彬说，《东方红》不仅是一部音乐舞蹈史诗，更具有政治意义，要在短时间内把这样一部宏大的作品全盘不走样学下来，任务非常艰巨。“我们当时是跟着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和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老师学习，首先要把人物形象、情节完整的学下来，然后还要把所有场面的群众动作、调度学下来。进了排练场，怎么去塑造人物形象，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武汉演员的身上。”

《东方红》北京版的演出阵容是3500余人，武汉版是1700余人，演员来自省、市、部队、院校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共80多个单位，包括湖北省歌舞团、湖北省歌剧团、武汉歌舞剧院、武汉市京剧团、空政文工团、

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等专业文艺院团，还有湖北艺术学院及武汉多所学校的师生，以及武汉、宜昌、襄阳等地的业余艺术爱好者，大家称之为“四方面军”。

1700余名演职人员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分为表演唱连、舞蹈连、民乐连、管弦乐连、舞台美术连等战斗组。由于演出规模超出以往，武汉剧院特地改建了舞台和合唱台，放大了乐池，才容纳下数百人的合唱团。

演员阵容中，有大家熟悉的湖北省歌剧团（湖北省歌舞剧院前身）演员王玉珍，



1965年4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武汉剧院接见《东方红》演员，前排左3为舞蹈家何风

她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韩英的扮演者，在剧中扮演迎接北伐军的农民妇女队长，演唱《农友歌》。刚从北京调到武汉歌舞剧院不久的歌唱家吴雁泽，在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中演唱《赞歌》。武汉歌舞剧院的舞蹈家刘凤，不仅在第一场《苦难的年代》中扮演一位忍痛卖掉女儿的农家妇女，还在最后一场担任新疆舞的领舞。有资料表明，汉剧大师陈伯华也曾主动请缨要求参加演出，“我演不来音乐、舞蹈，可不可以演江边一幕里的那个老婆婆？”但最终因为有其他排练任务，未能如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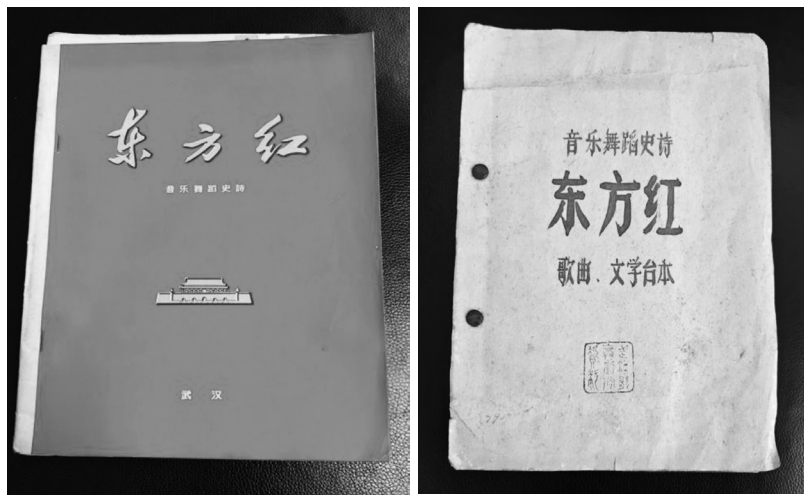
一份会议记录显示，《东方红》剧组提出“三过硬”的要求：一是政治思想过硬；二是业务水平过硬，学一样通一样，演什么像什么；三是身体健康过硬，能适应各种环境的演出。在分组排练中，剧组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形势报告会、观看电影，组织到部队、观看女排训练等多种方式，激发演职人员的情感。

表演唱连的分场导演、武汉歌舞剧院演员李凤文，在排练《井冈山会师》时，不仅学习毛主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等文章，还阅读了中共党史的有关章节，从中得到启发，丰富了导演构思。开始，她没有急于排练，而是向演员讲解《井冈山会师》的历史背景，并根据《井冈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曲的内容，要求演员在表演中必须充分体现对革命前途必胜的信心。同时，她还和宣传鼓动组一起，在排练场贴出“热烈欢迎南昌起义部队的同志们”“庆祝井冈山大会师”“坚决保卫革命根据地”等横幅标语，使演员一进入排练场，就被带入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东方红》剧组演员观看了电影《燎原》《两种命运的决战》，请有关同志讲述革命战争历史。有的连组织讲家史活动忆苦思甜，大大激发了演员的情感。许多即使是扮演群众角色的演员，也怀着饱满的感情作“角色自传”，对一个表情、一个动作都仔细推敲琢磨。空政文工团演员王燕，在排演《坐牢算什么》一场时，回忆了自己幼年作为孤儿的苦难经历，坚决表示要演出革命先烈的英雄气概。在反复练习一个摔倒动作时，手和腿都摔肿了，依然坚持练基本功。当她唱到“放出去，还要干”的时候，许多同志都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武汉市京剧团的演员杨正义和张连生，在《埋葬蒋家王朝》一场戏里，虽然只扮演一个号兵、一个旗手，但都苦练过硬功夫，力求将英雄战士的形象再现在舞台。杨正义曾以《不仅是翻筋斗》为题回忆当年排练过程：“我认真地学习了党的斗争历史，也想起了解放前自己的遭遇。在旧社会，我们唱戏的是被踩在最下层的。我十三岁那



武汉版《东方红》文学台本和宣传册 王娟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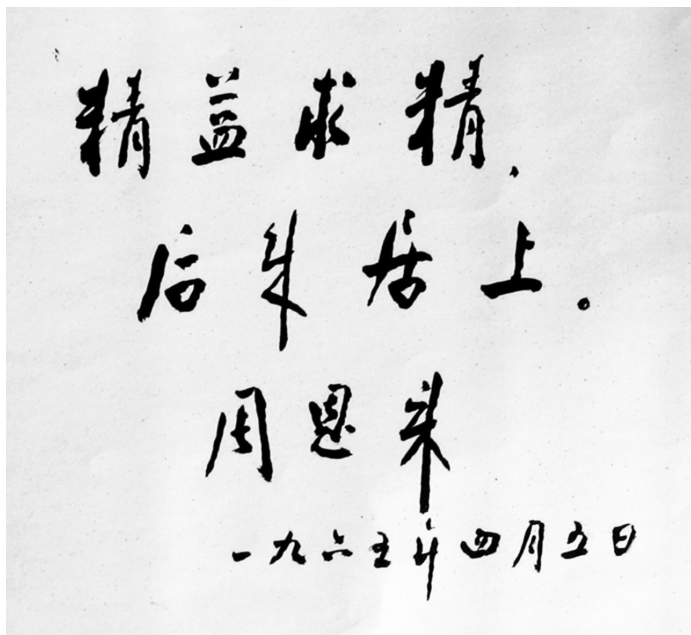
年，到乡下去唱戏，每天走几十里路赶台口，下雨地滑，几次掉到河沟里，大人把我从水里捞出来，赶到地方就要演出。我长了一身脓包疮，每天都躺在破絮里哭。解放后我成了人民的演员，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每当我想到这一切，排练劲头就更足了。全军指战员正等待着进军的号声，冲过江去彻底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而大江以南的人民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解放大军的到来，打碎身上的枷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怎能不使出全身力量来吹号呢？我就是带着埋葬蒋家王朝的决心来翻筋斗，用解放家乡和阶级弟兄的心情来吹号的，这样筋斗就翻得特别有劲，号也吹得有感情了。”

舞蹈连连长兼指导员李玉景，1949年曾参加渡江战斗。在排演《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演员的表现达不到要求，李玉景就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奋勇向前、不怕牺牲的精神，鼓励大家带着深厚的革命感情排练，以表现百万雄师的英雄气概。彩排时，这一场受到热烈欢迎，保证了较高的政治和艺术质量。

剧组的“活动日志”也显示，演员还去部队听报告会，看电影《雷锋》，士气高涨。凭着一股“只能给《东方红》添红，绝不给《东方红》抹黑”的热情和气势，在短短20天里，1700位演职人员齐心协力，将《东方红》搬上武汉舞台。

周总理题词“后来居上”

在武汉版《东方红》的排演中，何大彬不仅担任了一、四、六场的排练导演，还先后在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扮演工人领



周恩来总理题词

袖，在第四场《抗日的烽火》的《游击队歌》中扮演队长，在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一场中演出了新疆舞。据他回忆，虽然是严格按照北京版学习演出，但在排练过程中，也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了再创作。

在排《游击队歌》时，何大彬带着演员学习革命回忆录，为演员讲述白洋淀的战斗故事，然后进行排练。“我们的排练不光要从艺术上去抠他的动作，还要首先在政治上、思想上去引导演员，心里有了，动作上才会有。”

为了表现出游击队员机智勇敢、坚韧不屈的精神，何大彬结合青纱帐的布景和自身的技术特点，为人物设计了更多小的细节和技巧，让人物的塑造达到了新高度。在北京版《东方红》中，游击队长这一角色只有顿、跪、平转等基本动作。何大彬结合自己的技术特点，加入了空转和连续快速的蹦子双圈，紧接滑跪、劈叉落地等高难技巧，凸显了人物的英勇和灵活。同时，他也在表演中融入了更多细节处理：“这一段舞蹈是



1965年4月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与《东方红》演员合影，中为歌唱家王玉珍

队长把武器交给战士们，要大家隐蔽起来。我的体会是，这个时候战士们散开了，队长的心理状态应该是对战士们非常相信的，因为八路军是一支很有纪律的队伍，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队长在最后撤退，进入青纱帐时突然吸了一口气，回过头来警惕地环绕四周，目光绕了一个整圈，让全场观众的目光全部集中到队长身上。撤的时候也没有大步走，而是把半脚尖立起来慢慢转身，配合着舞台上的追光，再慢慢地蹲下去消失在青纱帐里，就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这两个小细节的处理很受欢迎，每次演到这里观众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很多年之后还有观众跟我提起这段表演。”

何大彬说，《东方红》作为一部革命史诗，一点细节都马虎不得。这些细微的改动和创作，他都征求了北京版指导老师黄伯寿的意见，才正式用于演出。“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的工人领袖，北京版由中央歌舞团演员扮演，他的个子非常高大，衣服扣得严严实实，非常威风严肃。我的个子不高，

我就在想如何表现这个人物的精气神，我就把衣服敞开，通过叉腰、握拳等动作，去塑造人物，更贴合工人的气质。因为我之前也学过戏曲，有一点底子，所以有观众说我这个亮相气宇轩昂。我觉得是演员通过形象、动作设计，呈现出来的感染力，超过了身高的影响。”

同样的提升，还出现在排练第三场《万

水千山》中的《飞夺泸定桥》。这一段舞蹈编得非常激昂，有许多摸爬滚打和翻腾的动作，去呈现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场景。其中一个小战士的扮演者，是武汉歌舞剧院演员高小麟。高小麟出生于戏曲世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大武生、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盛麟。高小麟发挥了自己形体的特长，在前进的舞蹈动作中融入了一连串筋斗，翻得煞是精彩，很好地展现了战士们冲锋陷阵的革命气概，备受观众好评。1965年10月，《东方红》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彩色宽银幕影片，高小麟被邀请参与《飞夺泸定桥》这场戏的拍摄，成为湖北省唯一参与《东方红》电影拍摄的演员，在大银幕上留下了英姿。“北京那么多演员，能邀请武汉的演员参加拍摄，证明了我们武汉的演员非常优秀，不仅有技术水平，也有自主创作的能力。”

《东方红》舞美连的负责人，后来任武汉歌舞剧院副院长的王树棠，曾以《浅谈

《东方红》的舞台幻灯》为题，在《武汉晚报》介绍《东方红》的舞美灯光再创作。由于《东方红》演出场面大、人物多、变换快，旧的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内容的需要，于是创造性地在天幕使用幻灯投射舞台形象，表现不同场景的真实环境，在淡入化出的变化中，把观众带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序幕场景中，蓝色大海衬托一轮红日东升的场景，是用五架幻灯投射的海与天空，红日是用特制的可以升起的专用效果灯投射，再加上水灯配合，体现了东方曙光的舞台效果。黄河、大渡河的激流、渡江战役的景象，是利用转泡水灯、环带水灯投射组成的；战斗中炮击的水花、水柱，还有天安门上空绽放的礼花，是用电影放映机投射的效果。天安门的夜景，用天幕前的幻灯投射形象，与天幕后特制的装有几组小灯泡的木制天安门外形骨架配合。毛主席画像、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字样，是从天幕后投射的。而《秋收起义》从音乐、舞蹈结构上都有很好的修

改，其中舞台美术修改较大，当秋收起义队伍手执火把由远到近在天幕形成一条火龙时，观众报以热烈鼓掌。舞台美术与舞蹈，远近、虚实的巧妙结合，有力烘托了情节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星火燎原的生动图景，激动人心。《打土豪分田地》表现湖南一带地主高宅大院的一角，四周有碉堡，前面有石桥，与右角的小茅棚形成鲜明对比。舞美组决定，在天幕上表现将土豪劣绅的碉堡打垮的情景，对灯光效果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终于做到当场把地主院落外围堡垒打掉。一声炮响，烟火齐发，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王树棠评价说，武汉版《东方红》的演出，以不断创造的精神加工修改，在音乐、舞蹈、表演唱、舞台美术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创造，更加丰富了形象。

令何大彬印象深刻的是，《东方红》舞美灯光的创新不仅体现在舞台效果上，也为幕后工作提供了更多便利。因为演员人数众多，换场时间非常短，舞美灯光组特意布



《东方红》演唱连合影

置观众看不到的小灯泡，用红、蓝等不同颜色，解决了不同组别演员上下场的指引和照明问题。“现在的舞台这种指示都很常见了，但在当时这是非常超前的。”

何大彬演出约 50 场后，将角色交给了 B 组演员。1965 年 4 月，他正在工厂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又被调回来排练。4 月 5 日，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演出。

何大彬深情回忆：“周总理看了以后也非常激动，上台接见了演员。我还记得，他一上台就被担任朗诵的演员吴中拦住了，吴中拿出准备好的本子和笔，请总理题词，总理二话不说，就站在台口的侧幕条边上写下了八个大字：精益求精，后来居上，然后总理走上舞台，和演员亲切握手。总理评价，我们的演员情绪非常饱满，非常好地表现了革命的激情，技巧也很完整，祝你们越演越好！这一场景给我们全省文艺界留下了永

志难忘的历史记忆，而且‘后来居上’这个评价非常高，后来广东省也找到我们学习，我们又全盘原原本本地教给他们。”

“熔炉”记忆终身难忘

据武汉剧院相关资料，《东方红》在武汉剧院连演 100 场，在江城掀起空前绝后的热潮。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多次转播演出实况。特别是武汉电视台从 3 月 10 日起，每星期三晚上都邀请《东方红》剧组教唱歌曲，街头巷尾处处都能听到学唱的歌声。《东方红》演出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近百起联系观摩的电话、信件和电报，接待工作应接不暇。

据《武汉晚报》报道，从 1965 年春节至 9 月底，《东方红》在武汉公演 217 场，观众达 58 万人次，还有归国华侨、港澳同胞及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演出



武汉版《东方红》剧照

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长，观众面如此广泛，演出如此热烈，是武汉市舞台演出实践中前所未有的盛况。

何大彬回忆，这么多场次的演出，难免有一些小意外。一次演出最后一幕新疆舞时，女演员跳到一半，鞋突然掉了。因为演出是现场伴奏，乐队继续往下演奏，怎么办呢？那位女演员很着急，就一边跳一边用脚去够舞鞋，但几次都没成功。四个八拍过去了，台上的演员都急得不得了，不少观众也看出来了，都站了起来。

正在台上起舞的何大彬急中生智，一下子转过去，把鞋扔进后台，又把手一招，女演员就顺势转入后台，他就拿着萨巴依（新疆舞中男舞者使用的手摇道具），把这段本由女演员完成的舞段接着跳完。“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这样史诗性的演出，必须保持完整性，这是一种战士的责任和天职。因为这段舞我在北京学过，就凭借自己的记忆和即兴的编排，用男演员的舞步把这段女演员的舞完成了。观众全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当我完成最后一个亮相，把藏族舞引出来的时候，跳藏族舞的演员都很吃惊。演出结束后，剧组马上开会总结，说台上无小事，要总结经验教训，也表扬我临危不乱，很智慧地救场。”

何大彬回忆，《东方红》在武汉的演出，不仅是1960年代的一件盛事，也像一座熔炉，锻造着经历其中的人们。在排演中，业余文艺爱好者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专业演员数。经过舞台实践，他们都成为单位、地区的文艺骨干，大大提升了群众文艺的水准。

专业演员同样如此。特殊年代，何大彬养了三年猪后回到舞台，仅用几个月时间就恢复了训练和演出。后来，他不仅排演了《打起莲湘庆丰收》《楚韵》等优秀



2025年1月，何大彬在家中接受采访
王娟摄

作品，斩获文华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还走进苏丹在非洲首开歌舞类的集训课，排演了一整台表现苏丹人民新生活的歌舞晚会，获得苏丹政府颁发的国家荣誉奖状。

作为亲历武汉版《东方红》排练演出的健在者，85岁的何大彬难忘这一段美好记忆：“参演《东方红》的经历告诉我，革命道路走得相当艰苦，胜利来之不易，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没有曲折和风浪，无论碰见任何困难险阻，都要以一个战士和勇者的姿态去面对。这是《东方红》留给我的最大财富。”

（武汉歌舞剧院提供资料图片）

王娟，长江日报记者

谱写一曲新时代履职奏鸣曲

◇ 徐 莉

人物名片：徐莉，民建武汉市委专职副主委，政协武汉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副秘书长。

我 2006 年任武昌区政协委员，2016 年任区政协常委，2021 年任区政协副主席，2017 年任民建武昌区委主委。有幸成为武昌民建和武昌政协发展繁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作为区民建负责人，我引领武昌民建会员积极发声。作为区政协副主席，我引导政协委员积极作为。双重任务交织，惟有加倍努力。我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不倦的工作态度，奋力谱写一曲新时代民主党派与政协履职的奏鸣曲。

业余“闹革命”也能闹出大名堂

民主党派的工作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难以“有作为”，但在我眼中这块工作仍十分有意义，业余“闹革命”也能闹出大名堂来。

2018 年武昌民建有会员 350 人，其中 70% 以上是企业家、企业高管。随着武昌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建会员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我担任区民建副主委后，结合党派经济界别优势，一方面将优秀的企业会员积极向区委统战部、区政协力推进入政协，另一方面在服务会员企业的同时为武昌经济发展助力。

我利用民建组织的优势，逐渐摸索出了助推武昌经济的有效经验。一是为武昌招商引资，力促会员企业在武昌注册。拥有嘉锐担保、华信金服等4家金融公司的会员王小虎是名优秀的年轻会员，经我代表党派大力推荐，区委统战部考察，成为2018年政协委员。当年王小虎参与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政府400亿引导资金招投标项目，成功取得其中10个亿的项目，为此他专门在武昌新注册一家公司，为武昌经济发展做贡献。

二是为武昌留住税源，会员企业发展外迁企业总部不走。由于受武昌地域限制，像景弘环保周国熠、起点人力朱运德、帝元投资雷汉池、同源医药的黄毅等一些会员企业纷纷在东湖高新、洪山、新洲等区购买了新的场地。为把根留在武昌，民建委员们选择将公司总部留在武昌。同时，我还积极鼓励支持会员企业在新三板上市，2018年民建会员企业起点人力和爱迪科技在新三板挂牌。

抢救武昌千年文脉经心书院

2016年春夏之交，作为政协委员、民建会员的熊华敏愁容满面，原来她为三道街的一栋老房子而忧心忡忡。她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经心书院面临拆迁！

经心书院为同治八年（1869年）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武昌所创办的著名书院，是湖北省重要历史文脉。在一次调研中，熊华敏得知这栋老房已被规划作为地铁站并四次收到拆迁通知书。

熊华敏向我反映了其困惑，我立即组织专题调研，并与她商议提出保护提案，向上级领导呼吁建议保留经心书院。同时，经我组织多次讨论修改的民建界别《关于抢救



复建后的经心书院

经心书院，擦亮昙华林历史新名片的建议》被评为政协大会优秀发言第一名，受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心书院遗址终于被保留，并已启动重建工程。经心书院必将传承赓续大成武昌千年文脉，成为湖北省的重要文化地标。

作为区民建主委，我团结带领民建会员履职尽责、双岗建功。多项课题成果上报省市民建、区政协，转化成协商议政发言。其中《发展红色教培产业 让红色文旅精彩绽放》《以建城1800年为契机 将武昌打造成世界文明对话和全球合作的重要窗口》《打造古城门意象，创建新消费场景》等由我组织民建界别政协委员反复打磨，分获区政协十五届一次、二次、三次大会优秀发言第一名。近10年来，武昌民建有2篇社情民意被中央统战部《零讯》采用，18篇被全国政协采用，20篇被民建中央采用。

担任区政协副主席以来，我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文史学习委“专”的优势，紧盯热点、抢抓机遇，组织专题调

研，形成优秀调研成果。如我组织开展“关于持续强化‘大黄鹤楼—武昌古城’品牌效应的建议”课题调研，系武昌区政协首次跨党派、跨界别、跨专委会组建调研团队，组织课题组赴云南大理等地深入调研，八易其稿，圆满完成课题任务，并在区政协十五届十一次常委会暨议政性协商会上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建议，供区委、区政府决策参考。该课题成果荣获2023年度武昌区优秀调研成果评选一等奖（第一名）。

三年来，在充分调查基础上，我分管的文史委各界别委员共提出大会提案160件，撰写大会口头发言11篇，其中有7篇获得优秀大会发言。

社区眼中的“哆啦A梦局长”

新冠肺炎疫情，是武汉人民永远的历史记忆。我积极调动整合民建会内外资源，为抗疫工作尽绵薄之力。

2020年春节期间，正值疫情封城，“武汉市第三医院病区全开，一线医护人员‘裸奔’”的朋友圈信息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

面对疫情，广大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线，没有基本防护好比战士没有枪啊！担忧之际，刚好朋友从德国打来越洋电话拜年，问是否需要印度进口N95口罩，真是“及时雨”啊！

我立即组建了16人的微信工作团队，分别明确定货、捐款、报关、物流等职责分工，从印度订购N95医用口罩。同时在武昌民建微信工作群，发出了专项捐赠倡议书，不到半天时间就收到29位会员9.5万的捐款，为抢时间尽早报关，微信团队常常要沟通到凌晨1到2点。经多方联系，并在上海海关、武汉海关、湖北慈善总会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抢在经印度飞中国

停航前的最后一班航班，从印度孟买一路历时4天，将58箱共计99459个口罩送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时任武昌区行政审批局长的我下沉华锦和水域天际社区进行防疫支援。我连续战斗20多天，一天爬楼100多层，帮助街道、社区解决物资缺乏、封控工作、疫情去世人员安置等难题，受到街道的肯定、社区的称赞，并被社区称为“哆啦A梦局长”。

在支援社区工作过程中，我发现岗亭保安没有防护手套，立即组织安排由区民建会员参与发起的“武汉精神”志愿者团队，捐给武昌区物业协会医用手套、护目镜、隔离衣等物品。

封控中居民急缺新鲜蔬菜，两次组织广东徐闻县千里驰援60多吨新鲜蔬菜给社区居民。物资最匮乏的时候，收到四川、天津民建捐赠的整卡车抗疫物资，并一一送到居民家中……

八年兴山帮扶行

武昌区政协、民建武昌区委自2016年3月开始对王昭君故乡——兴山县开展精准扶贫。八年来，我每年都带队前往兴山县开



徐莉给兴山孩子颁发助学金

展扶贫脱贫、乡村振兴帮扶、捐助活动，为兴山县提供资金、物资和项目等数千万元。

一份帮扶一世情。武昌民建开展“大手牵小手”捐助活动，民建企业家已累计对口向兴山一中贫困学生捐资40万元。2016年，兴山一中学生李晓倩的父亲受伤生命垂危。我立即组织区民建企业家会员开展“预定爱心橙，挽救一个家庭”义卖活动，仅用一天时间就筹集到了李晓倩父亲手术的全部费用。

一场和死神赛跑的救助，终于把李晓倩父亲抢救回来。此后会员何翠文对李晓倩家开启了长达7年多的结对帮扶。在民建武昌区委会与何翠文的支持与鼓励下，李晓倩考取了大学，现已在武汉一家会计事务所上班。

2016年，会员孙子强在宜昌考察工作期间，特意驱车前往兴山县黄粮镇金家坝村走访慰问与民建结对帮扶的学生万同学家。19岁的万同学，其父因在石矿务工致残现仍在浙江打工，母亲在其8岁时因穷困离家出走再无音讯，爷爷奶奶已年过7旬靠农村每人每月50元的低保金和种植玉米维持生活。

孙子强现场联系了宜昌的实业单位，由该企业为其父亲提供一个能胜任的岗位，工资不低于其在浙江务工的水平，在解决其收入问题的同时也能经常回家照顾两位老人。孙子强还一直以现金和实物形式资助万同学大学期间正常生活费用，并定期到万家慰问老人，关注祖孙三代的生活和心理健康。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组织民建企业家为兴山县发展出谋划策，最终帮助该



在兴山县榛子乡民宿生态旅游项目现场考察调研

县南阳镇成功争取到湖北省“美丽乡村”300万元专项政策资金扶持。此外我每年都带去一批民建企业家、技术专家，为当地农民提供搭建信息平台、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建设养殖种植生态养生休闲旅游等提供指导，进行项目对接。

2018年，会员熊华敏的经心书院为兴山水月寺镇中心学校捐赠图书，筹建“经心希望书屋”成功揭牌。会员杨城先后七次来到兴山，走进秦宝年家和蜂农的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传授助销方式帮助他们走勤劳致富的路子。

兴山县扶贫振兴活动，见证了全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成为武昌政协、武昌民建的闪亮名片。

寻源武汉话郢国

◇ 朱绍斌

“九省通衢”武汉市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北部，滚滚长江与悠悠汉水交汇处。包括汉阳、汉口、武昌以及周边郊区的大武汉是江汉地域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西周、春秋时期，这里属于郢国统治范围。春秋时期，郢国并入楚国，融入楚国的核心地域。从出现在历史舞台，到汇入荆楚文明，郢人存在了两千多年。郢国，是江汉平原东部古代文明的发端，也是值得珍藏的荆楚文明记忆。

郢国源流之谜

关于郢人的起源，有与周同源、与楚同源、与秦同源、自成一系等多种说法，甚至有说郢人系巴人的一支。

一种意见认为郢人与周同源，系黄帝一脉。翦伯赞《中国史纲》指出：“黄帝之族，恐怕是由几个胞族组成的一个部族，所以其中有属于一个胞族的五个氏族，是以云为图腾……”妘（郢）部族是黄河流域华夏部落联盟的一支，是夏、商时期即存在的古老部族。史载“上古八大姓”为“姜、姬、妘、姁、嬴、姁、姚、妘”（一说为“姬、姜、姁、嬴、妘、妘、姚、妊”），均起源于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轩辕氏，“妘”为其中之一。

云阳氏族裔曾在今关中云阳之地建立妘氏部族方国，为商朝属国。《散氏盘考释》一文指出：“商代的妘氏国，在云阳。”何光岳《邳子国考》指出：“邳部族起初是以云为图腾的，他们系黄帝一族后裔，居于少昊氏的云阳故地……在氏族社会时，于云

图腾云旁加女成为‘妘’字，作为姓氏，象征着母系社会进展。以后进入父系社会，也由游牧走向定居时，便出现封国，于是去女旁而加邑旁，成为‘郢’字。”

另一种意见认为郢人与楚同源，系祝融之后。《史记·楚世家》记载，上古时

期“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高阳氏）是黄帝的孙子。帝喾（高辛氏）继颛顼之后成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以颛顼的孙子重黎为火正（专司用火的职官），赐予“祝融”之号。重黎后被帝喾诛杀，他的弟弟吴回接替火正之职，仍称“祝融”，即传说中的火神。吴回的儿子为陆终，传说其妻腹裂而生六子，依序为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晏安、季连，其后裔繁衍出众多部族，史称“祝融八姓”。

楚人系陆终第六子季连之后，芈姓，后被封在荆山。而郢人的祖先，就是陆终的第四子会人，名求言，妘姓，被封于郢（今河南新郑一带）。夏、商时期，妘姓族裔与同出一源的芈姓楚人同时开启南迁进程。楚人先祖迁于今豫西南、鄂西北的丹水、淅水流域；郢人先祖迁居江汉地域。西周、春秋时期的“郢国”，与楚同封子爵，以大洪山为界，楚在西，郢在东，常发生战争。

还有学者认为郢人与秦同源，嬴姓之国。南宋罗泌《路史·后纪七》“少昊篇”记载：“白、郢、复、巴、寘、谷、糜、郢、葛、祈、谭，皆嬴姓国也。”《路史·后纪八》又载：“郢，嬴姓国……灭于楚。”明代刘绩《春秋左传类解》载：“郢，嬴



郢国在江汉地区的位置示意图

姓，祝融之后，封于罗，号妘子，在云杜。若高阳之裔，则若敖父子何以娶郢女？”意思是说，古人遵循“同姓不婚”的原则，郢人如果与楚人同姓，楚国君臣怎会一代代与郢国通婚？

综上所述，郢人祖先是华夏部落联盟的一支，世居黄河流域，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启南迁进程。商代晚期，妘部族的一支辗转迁徙至今沮水流域以及汉水下游，在以今汉阳、安陆、云梦、京山等为中心的鄂东北、鄂中地域繁衍、生息、发展。西周时期，这个妘部族分封为诸侯国，子爵，即郢国，史称郢子国，与楚国“爵位相等，地分东西”。

春秋时期，郢国并入楚国，融入楚国的核心地域。从出现在历史舞台，到汇入荆楚文明，郢人存在了两千多年。

郢国演变之谜

郢人远祖作为华夏古族的一支，最早居住在陕西云阳一带，称为云（妘）部族。随着古华夏族的繁衍、开拓和华夏文明的发展、传播，郢人随华夏部落联盟诸部族沿黄河东下，迁移到黄河中游即今河南新郑、新

密一带。早在唐尧时期，即存在有郅氏部落方国。

在华夏部落联盟征服有郅氏后，古帝颛顼后裔、祝融之后陆终第四子会人入主有郅氏，以妘为姓，成为“祝融八姓”之一。东汉郑玄《毛诗谱》载：“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历唐至周，重黎之后，云（妘）姓处其地，是为郅国。”此地妘部族西周初年被封为郅国，子爵，直至春秋初期被郑国所灭。妘部族在黄河中游的“祝融之墟”前后定居一千多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郅，祝融之后，妘姓所封，浚、洧之间，郑武公灭之。从邑，会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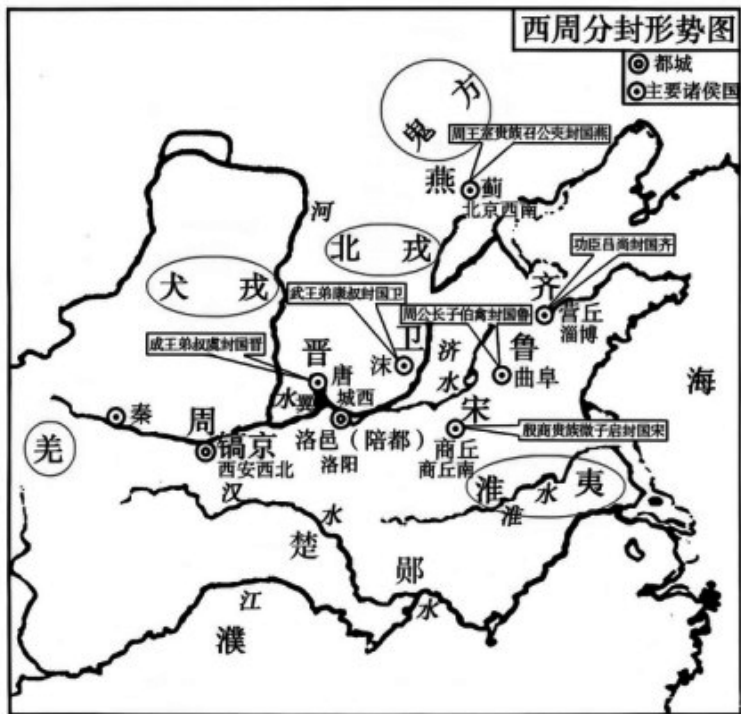
尧、舜、禹时期，生活于长江中游一带的“三苗”部族崛起，威胁中原华夏文明发展。华夏部落联盟发动征伐“三苗”的战争，至大禹时期取得决定性胜利，打开了南下江汉地域的通道。郅人先祖或随中原华夏部落联盟征伐“三苗”、或随大禹治水、或

被中原政权压迫，因多种原因开启了南迁江汉地域的进程。商代，对江汉一带“蛮荆”的征讨，推动妘姓部族继续南迁。商代晚期，郅人开始定居汉水下游以及沮水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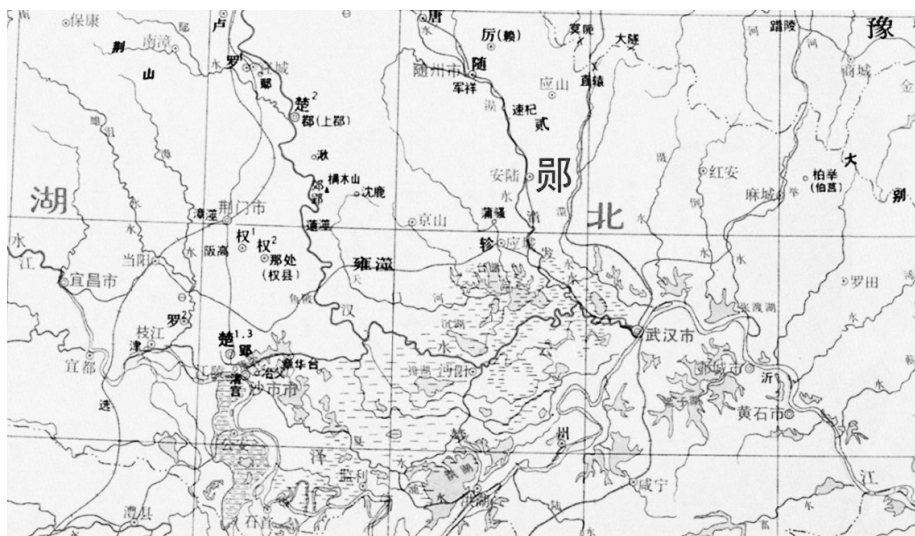
何光岳《邳子国考》指出：“邳子国是一个出现于唐虞时代的古老部族，为祝融八姓之一，与荆楚同祖。起初，它的部落繁衍，逐渐分成一些支部落，散布在黄河中游一带，即其始祖祝融氏之墟的附近，仍以妘为姓，而妘姓的嫡裔仍以妘姓为国号，周初受封为子爵，乃去女而加邑旁，成为邳子国。在殷商时期，祝融系诸部族遭到殷商的征伐，甲骨文中‘癸酉，来正人方，才云奠河邑’。云部落被迫由东向西南退却，邳子国也由河南迁入湖北，辗转定居于安陆，后来被楚所灭，遗民曾被迁至湖南的茶陵县，一部分被吴国迁到江苏如皋县，这个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妘国，是值得进行探本究源的。”

在《楚灭国考》一文中，何光岳进一步解开郅人南迁江汉之地的谜团，“邳人……殷末周初，犹为关中著姓。邳、妘、嬭字同，故关中出土西周金文，犹多言邳姓。则邳地当在今陕西云阳，正位于其祖吴回始居地吴山之东，以后才东迁到河南新郑，以姓为国；因不愿臣属商朝，便遭到商的征伐。卜辞有‘癸酉，来正人方，才云奠河邑。’这个邳姓国，当在郅（今河南新郑）的地区。”

商代晚期，妘姓部族的一支离开中原，南迁生存环境相对较好的江汉地域，逐渐安居乐业。西周初期，郅人因参加周武王灭商而受到封赐，以族姓



西周分封形势图



古代云梦泽与郢国（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修订）

“𡈼”作国名，去“𡈼”字的“女”旁而加“邑（阝）”旁，成为郢（郢）国。至春秋初期，它的疆域范围，大体上南至今武汉市汉阳、汉口一带的长江之滨，北至今孝感市与随州市接壤，西与大洪山区的荆门市所辖之京山市为邻，涵盖孝感市域，东接大别山区，南至天门市、仙桃市（沔阳）以及潜江市部分地区，幅员广阔，雄踞江汉。

郢国地望之谜

古代文献记载，郢国在今湖北省武汉市江北地区、孝感市所属的安陆市、云梦县以及荆门市所属的京山市等地。

今武汉市属于古郢国统治范围的地域，主要是长江以北地区。据古籍、古志记载，今武汉市长江以北汉口、汉阳、汉南、蔡甸、东西湖等地，在西周、春秋时期均为郢国所辖地域。《广韵》：（沔州汉阳郡）“春秋，郢国之地；战国时，属楚；秦属南郡；武德初置沔州。”

汉阳区

唐·杜佑《通典》“州郡十三”：“汉

阳郡……沔州（今汉阳县），春秋郢国之地。战国时属楚。秦属南郡。……大唐武德中，讨平朱粲，析为沔州，或为汉阳郡。领县二：汉阳（汉安陆县地。隋初置汉津县，后改为汉阳。有汉水，一名沔水。又有沌水、淝水、鲁山。沌音屯。淝音摄。）

〈𡈼義〉川（汉安陆

县地。后魏为〈𡈼義〉川郡，后废郡为县也。〈𡈼義〉音义）。”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一：“汉阳军，本故沔州也。春秋时郢国地。《左氏传》曰：‘郢人军于蒲骚’。杜预注云：郢国在江夏云杜县东南，楚灭之。按，郢国，今安州城是也。……於菟村，斗伯比外家处生斗谷於菟，为楚令尹。”

南宋祝穆《方輿胜览》“汉阳军”“建置沿革”：“（汉阳），《禹贡》：‘荆州之域’，在天文为‘翼轸之分野’。春秋时郢国地，战国属楚，秦属南郡，汉为江夏郡安陆县地。……今领县二，治汉阳。”

《汉阳区地方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汉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江汉地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距今约5万年至1万年前，汉阳境域即有古人类活动。夏代，境域土著三苗部族被禹征服。春秋战国时期，境域先属郢国，后入楚国。”

2015年重修《汉阳区志》记载：“距今约5—1万年前，汉阳区境域在远古就有古人类活动。夏代，境域原住民三苗部族被禹征服。置商末周初，先隶南国，后属郢国。”

汉南区

《汉南区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汉南区原属汉阳县，商末周初，先隶南国，后属郢国。春秋战国时期，隶属楚国。秦统一中原时，属南郡。汉属荆州江夏郡，分属安陆、沙羡县；后置沌阳县，复为安陆县。”

蔡甸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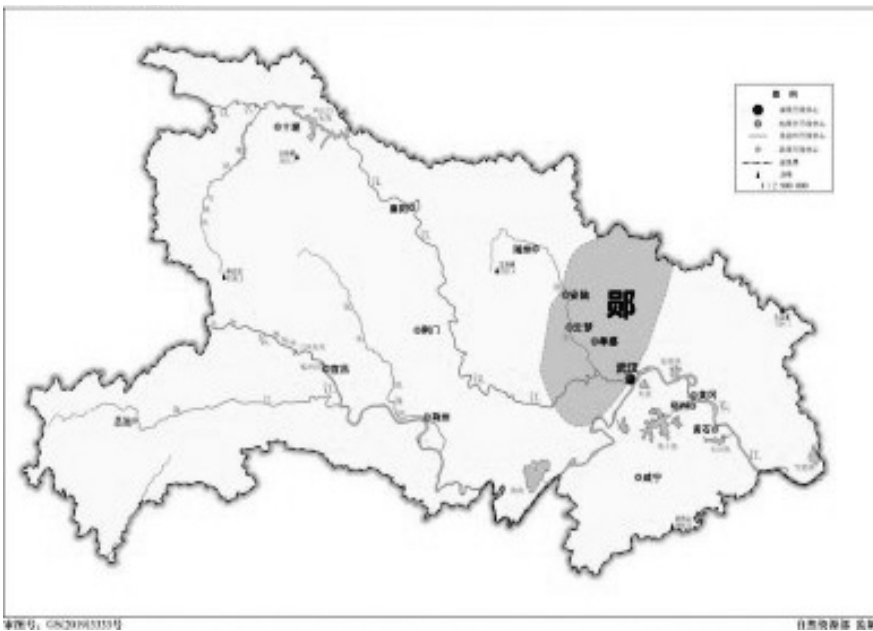
《蔡甸区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是武汉市所属的一个远城区，原名汉阳县，位于武汉西南，长江、汉江交汇的三角地带，江汉平原濒临长江之处。其建置沿革：蔡甸区（原汉阳县），商末周初，先隶南国，后属郢国。春秋战国时期，隶属楚国。秦统一中原时，属南郡。汉属荆州江夏郡，分属安陆、沙羡县；后置沌阳县，复为安陆县。”

东西湖区

《东西湖区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东西湖区原是云梦泽的一部分，云梦泽之云，出自远古时代的妘姓之国，史称‘郢国’，也写作‘郢国’；至今有渍水经东西湖区汇入长江（所谓渍水，即古郢国所傍之河流是也，今又名府河）。”

郢国消亡之谜

宋焕文《安陆新考》指出：“（西周时期）郢国在当时是一个与楚国、随国势力不相上下的国家，经蒲骚之战后，就一蹶不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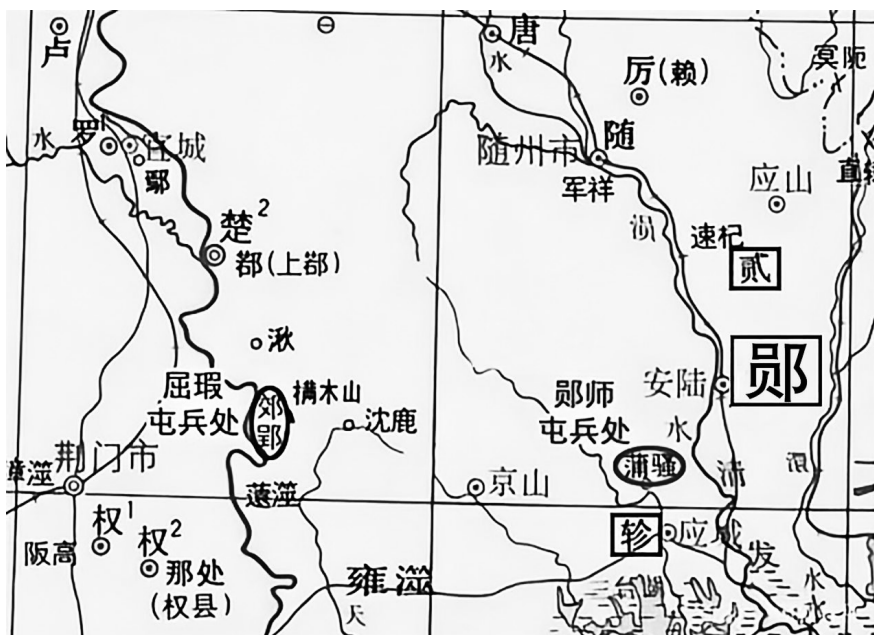


春秋时期郢国疆域示意图

直被楚人控制为附庸，不知何年为楚所灭，史无明文。”在强大的周王朝庇护下，郢人在鄂中渍水流域平静地生活了数百年，直到周室衰微于公元前 770 年东迁洛邑。

春秋初期，僻处荆山的楚国强势崛起，不断侵并汉水流域众多诸侯国——“汉阳诸姬”。处于楚国扩张兵锋所指的郢国感受到严重威胁，于是联合遭到楚国欺凌的随国、绞国、州国、蓼国等组成联军，共同抵抗楚国入侵。公元前 701 年，郢、楚双方爆发了决定郢国生死存亡的大战——蒲骚之战。郢国战败，逐渐消逝于历史的尘埃。

据何浩《楚灭国研究》指出，《左传·宣公五年》记载楚国若敖氏（楚国第十七位君主熊仪，公元前 790 年—公元前 764 年在位）娶郢女为妻，生斗伯比。公元前 704 年，楚武王沈鹿（今湖北钟祥东）会盟，郢国参加。公元前 701 年，楚国在“蒲骚之战”击败郢国，慑服随国等“汉阳诸姬”，完全取得在汉水以东的霸主地位。郢国大约于楚文王时期（公元前 689 年—公元前 675 年）被灭。也



春秋时期郢、楚“蒲骚之战”战略态势示意图

有学者认为，郢国灭亡于公元前 584 年钟仪担任郢公之前。总体来说，“蒲骚之战”以后，妘姓郢国再未出现在历史记载，取而代之的是楚国设置的县级地方行政单位——郢邑。

关于“蒲骚之战”，《左传》有载。楚国在西周后期开始启动扩张进程，楚武王熊通时期扩张势头更为凌厉，逐步占领江汉平原西部，同时不断以武力侵并江淮地区。地处江汉地域要冲的郢国首当其冲，便联合邻近诸侯国合力抗楚。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 701 年）春，楚与贰（今湖北广水）、轸（今湖北应城西）结盟，对郢国采取包围态势。郢国联合随、绞、州、蓼等诸侯国，在郢国西部边境的蒲骚之地集结兵力抵御楚军。楚国统帅屈瑕采纳斗廉的建议，派精兵夜袭蒲骚，大败郢军。此战之后，郢国再无还击之力，最终被楚所灭。

楚灭郢国后，郢人不甘臣服，部分郢人沿汉水上溯，迁至麇国（又记作麇国，今湖北十堰一带）故地，仍称“郢”，这就是湖北郢阳、郢县、郢西的来历。

春秋后期吴楚相争，部分郢国遗民东奔吴国，迁居江苏如皋滨海之地；还有部分郢国遗民被楚国驱赶到今湖南茶陵云阳山一带。郢人，写下了一曲悲壮的历史浩歌。

延续数百年的郢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郢国并入楚国后，郢人与楚人及其他诸侯国居民杂居通婚，结成

血缘纽带，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体，吸取南方各诸侯国以及“楚蛮”文化，发展为丰富多彩的楚文化。而江汉地域的居民也融合了各部族的文化血液，形成坚韧刚强的南方型华夏族系，为秦汉时期的文明富强提供了先决条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团结和融合发挥了重大作用，为秦、汉统一天下，移民开拓，奠定了良好基础。

朱绍斌，作家、文化学者，安陆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我在武汉的“黄金十年”

◇ 刘萌（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刘萌，全国工商联十三大代表，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委员；长江国际商会创始人，长江产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湖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湖北省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湖北大学产业教授。

缘起长江，十年前我来到江城武汉——这座因江而兴、以江为轴的城市，开启了人生新篇章。作为时代大潮中的一朵小浪花，回首在武汉的黄金十年，我做成了三件事情：创立长江国际商会、发起长江产业基金、打造校友经济平台，为湖北武汉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因为长江，我与湖北链接十年，让作为山东人的我，深深地爱上湖北，收获深厚的长江情。这十年，是城市生长的年轮，亦是长江奔涌的刻度，长江水教会我一件事：人得像浪头，撞了堤岸碎成沫，转头又聚成新的潮。

以长江之名，静水流深汇力量

我出生在山东枣庄，从小听着台儿庄大捷的故事长大，家乡铸就了我的性格底色：质朴忠厚、重感情、讲义气、敢闯敢拼，这些让我受益终身。在国企按部就班工作十余年后，我选择了下海创业，那一年刚35岁。做出这个选择时，内心并没有被狂热的激情所支配，反而十分冷静。我深知自己一直都是一个“求变”的人，不会拘泥现状，时刻想冲破枷锁，去追求自己心中的事业。

在那时“遍地是黄金”的北京，我创业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便开始广泛投资。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武汉考察生物医药领域的项目，没想到从此在武汉扎下根，成就人生意外转折。

记得第一次站在长江边，江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远处货轮鸣笛，岸边高楼林立。那一刻我就想：这地方有股说不出的劲儿，



刘萌连任长江国际商会第三届会长

像极了山东人的直爽，又带着南方人的灵活。后来在武汉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拥有了家乡般的温暖，也想为这座城市做些事情。

2014年，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支持下，我与李嘉诚先生、“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和美国著名侨领方李邦琴女士，在武汉发起成立了长江国际商会。

组建初期，我们就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商会，实施长江经济带双向国际化战略，解决会员信息不对称和信任不对称，构建以湖北为中心的跨区域和国家的经济交流、合作与发展平台，致力创建全球商业领袖平台。

因此商会的定位，是以长江为链接，聚焦外地人在湖北和湖北人在海外的“两外”，不仅汇聚海外的商业力量，也让我们这些外乡人拥有一个给湖北做贡献的平台。2014年5月20日，成立大会召开，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出席了会议。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先生出任首任会长，此后我接棒第二届，连任第三届会长。

十余年间，我们主要就干两件事：将海外资源引到湖北，助力湖北企业走出去。先后邀请了霍震寰和洪秀柱等二十余位国际政商大佬到访湖北，促成史带保险和爱康

国宾等40家企业投资落户湖北；累计30余次带领湖北民企走出去，促成20多个项目的并购合作。

我们还在全球设立同名商会的创新模式，共用一个名字、共建一个组织、共享一个平台，在美国纽约、旧金山、亚特兰大，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成立了十家同名商会，致力于做最本土化的国际商会和最国际化的本土商会。

为了更好地把资源与资本进行链接，在这片创新创造的热土上，我又参与发起和创建了长江产业基金。2015年，这支国内单体最大的产业基金应运而生，前瞻性布局湖北的新质生产力，是全国市场化产业基金的标杆，也是湖北混合经济的代表。

至今，已参股设立43支母基金和81支子基金，认缴总规模7729.19亿元，100多家被投企业上市。基金不仅培育了湖北80%以上的独角兽企业，还参投了80%以上湖北重大战新产业项目，为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力。

以校友之情，凝聚初心向未来

我曾在北京大学就读管理硕士，后又回北大攻读工学博士。在北大的学习时光，不仅转变了我的思维逻辑，更有幸结识许多优秀的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校友情。

这份校友情不仅为湖北的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添砖加瓦，还曾在武汉的艰难时刻雪中送炭。2019年底，作为湖北省北大校友会会长的我，在武汉承办了北京大学全球校友大会和第十三次校友工作研讨会等系列活动；2020年初，武汉战疫期间，我发起并组织了北大全球校友“百万口罩行动”，还在湖北省慈善总会设立北大校友公益基



2023 武汉校友经济论坛召开

金，向湖北襄阳、十堰、石首、公安、黄陂，江苏邳州和山东枣庄等地捐赠了一批紧缺的医疗设备。

大学的校友情，处于青春最纯粹时期，是一种特别浓烈且不可逆的情感记忆，凝聚着人生初心和对母校的深厚感恩。武汉是大学之城，更是校友之城，不仅有 160 多万大学生，还有逾 100 万在册的各高校校友会校友，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如星星之火燃成燎原。这是一股强大的、多元的、隐形的力量，是将科教优势转化成城市发展胜势的依托。

我创建并担任会长的武汉市校友经济促进会，作为国内首家校友经济促进会，现已汇集 187 家高校湖北校友会和百万校友。我们充分发挥校友资源优势，推动资本、科技和人才“上山下乡”，将市校友经济促进会乡村振兴专委会落户红安、茶文旅产业专委会落户天门、武汉校友经济促进中心落户黄陂，让校友经济延展到田间，让最新科研成果落到地头，作为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融合发展。

我们提倡“不设限创造”“让每一位校友都发光”，以“推动校友经济、传播校

友文化、助力校友双创”为使命，以常态化、专业化、团队化和生态化推动校友经济发展，不仅引进了“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等，还推动挂牌了全国第一家校友经济大厦。

在最近 3 年，我们举办了 133 场大小活动，创建召开“武汉校友经济论坛”“楚商校友经济论坛”“全球校友经济论坛”“鄂港高才校友经济高峰会”等品牌活动，不断地创新校友经济思想，

让武汉校友经济成为全国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之一。

我始终认为，校友经济是建立在情感认同基础上，在越来越智能的时代，纯粹的情感愈来愈弥足珍贵。情感力量是推动人类变化的深刻源泉，将超越权势屏障而永久，大学将不随世俗形态变迁而存在。正是这种深厚的情感链接，赋予了校友经济生生不息发展的动力，从联络、联谊、联合到联动，成为推动母校和母城发展的平台。

随着校友经济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现已成为许多城市汇聚科技人才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与新引擎。在市政协第十四届第三次会议上，我的提案《关于以校友经济招引科技人才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建议》，被评为 2024 年度好提案，予以通报表扬；在省政协第十三届第三次会议上，我的提案《关于以校友经济共同缔造海外同心圆的建议》被大会点名表扬。

以委员之责，知行合一勤履职

多年来的履职经历，让我对政协委员的工作有了许多体验与感悟。特别是只有

多付出时间为群众做事，才能成就事。作为市政协科技界别召集人和省政协工商联界别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四年来我参加省市区三级政协活动时间累计已逾100天。

担任政协委员以来，共提交25件提案和8篇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全面改造沙湖公园打造汉版“中央公园”的建议》提案，得到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帮助推动落实专项资金，解决了群众游园不便的难题；《关于加大政策支持为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的建议》提案，得到省市领导重视，推动了行业标准的研究制定和出台。

履职不接地气，就成了空气；联系没有平台，就只有平凡。我创建刘萌委员工作室，在沙湖公园投资兴办《歌笛琴韵 沙湖前世今生》公益展览，免费向群众开放和义务讲解荆楚文化，成为委员的会客厅，三年来接待群众逾万人次。还举办委员读书会，及科技工作者融合赋能大讲堂等百余场次公益活动。



武昌区沙湖公园琴桐馆



参加2025年武汉市两会

人民公园与人民政协有着相通的内涵与属性，是反映社情民意、联系服务群众的好场所。目前，我正将位于沙湖公园的琴桐馆改造为协商文化主题馆，计划在馆内设置省市区三级政协委员联合工作室、大道同心文化展览厅和委员读书基地，以“AI互动数智人”等新技术载体，实现群众民生信息的收集，定期举办界别读书会和政协委员见面会等活动，让委员履职与时俱进和灵活有效，成为征集民意和服务民生的新路径。

同时，借鉴学习杭州、广州等地政协的经验做法，积极探索凝聚共识的新载体，结合协商文化主题馆创建，建议将沙湖公园扩展为“政治协商文化主题公园”，用道路串联起协商文化的精髓，介绍政协的优良传统和政协文化。

初心不改，方得始终。2023年，我被评为武汉市优秀政协委员；2024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政协委员。多年的履职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服务人民是委员履职的“命根子”，零距离履职，一切等同于零。

从田间到高楼：我的潮江记忆

◇ 宋武汉

人物名片：宋武汉，汉阳区政协委员，武汉潮江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我是一个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新时代企业家。19岁那年，在汉阳区江堤乡潮江村委会开始工作生涯，从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一步步做起，28岁进入两委班子，44岁成为村集体企业的掌舵人。

2017年，我当选为汉阳区政协委员。无论是“挑堤防汛”还是城中村改造，我始终秉持“勇立潮头，争创一流”理念，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三十多年光阴飞逝，在潮江这片土地上，我不仅成就了自身的发展，也见证了家乡的蝶变与新生。

记忆中的乡愁：童年的潮江

四十多年前的江堤乡潮江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黄土地、鱼塘、平房、山包、

泥泞小路、水井、土茅厕，还有随处可见身着补丁衣裳下地干活的人们。对于城里的孩子而言，农村这个“新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和神秘，而对于土生土长的潮江人却是那么的亲切。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父母总是牵着我走在田埂上，去村办学校读书。村里有个很大的“打谷场”，每到了丰收的季节，打谷场上就堆满了金灿灿的粮食。父亲在田里插秧，母亲带着哥哥姐姐们“绞靶子”，而我这个傻小子却踩着稻谷攀爬着谷堆，想象自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

骑着牛，当一回牧童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头戴着杨柳枝编织而成的草帽，总觉得自己又是一个“小兵张嘎”，胸前飘舞着的红领巾分外鲜艳。老牛、牧童、杨柳，那是多么诗情画意的一幅画卷。那时的我只想快快长大，像歌声里唱的那样，做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

父亲是勤劳朴实的农民，自村里开展



2023年2月1日，潮江商贸集团联合潮江社区庆元宵舞龙民俗表演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后，他就承包了一片荒地，带着我们这些孩子们一起挖土建池塘养鱼，还在池埂上栽桃树。没过几年，但凡每到乍暖还寒的时候，池塘边便是一片“桃花烂漫”，肥美大鱼也可以怀中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影响，潮江村办起了集体砖瓦厂，解决了许多村民的就业问题。普通村民买起了电风扇、电视机、电冰箱、小灵通，装上了电话、宽带、电脑，那时候能够这样改善生活条件，在当地可谓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看着村民们自建了猪舍和渔台，买来了一台台拖拉机、神牛农用车，将平房建成了小洋楼，我在心底为他们高兴。

家乡的蜕变：从泥土到高楼

眼前的潮江越来越明亮了。山沟与耕田不见了，桃林和鱼塘消失了，而一栋栋居民楼拔地而起，一辆辆汽车呼啸而过。村民

们的笑容渐渐多了，孩子们你追我逐，打闹嬉戏。家家户户，老老少少，他们赶着趟儿来吊唁，吃着流水席。不可否认乡亲们的荷包真是鼓起来了，大家的确富裕起来了。丧礼过后的一个清晨，我看见村里的人们纷纷都走出家门，舒活着筋骨，抖擞着精神，各自忙活着。

潮江人经历了“挑堤防汛”“种菜喂鱼”“房屋拆迁”“还建房过渡”等苦日子，走过了“分田到户”“城中村改造”“股份量化”等特殊时期，完成了从田间到高楼的身份转换，共同

迈向新时代。村民们现在很清楚，幸福生活这才刚起了个头，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有的是幸福。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如今的潮江村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规模极大的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设施先进的亚洲心脏病总医院，科技与高端商务相结合的“华中智谷”纷纷落户周边，放眼望去一片繁华景象。

在潮江这片土地上，现代化的商业中心高耸，便利快捷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成绩属于勤劳实干的一代代潮江村村民，更属于党的领导，共同迈进光明幸福的新时代康庄大道。潮江的蝶变，正是武汉伟大变化的一个缩影。

委员的使命：守护与担当

我在潮江工作多年，在实施城中村改造、集体经济改制的潮江商贸公司中，先后担任党支部委员、副书记及董事、总经理等职位。2016年1月，由于组织和525名股

民的信任，我出任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在44岁时成为村集体企业的新当家人。2017年我被推选为汉阳区政协委员，2019年增选为汉阳区政协常委，自此肩负起了对这片土地和民众更大的责任。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汉阳区政协发起“封城不封爱，委员在行动”的倡议。我秉承汉阳情怀、守护汉阳家园，发动所在公司，为防疫工作紧急捐赠10万元；号召公司全体党员和员工捐款共计11500元；向江堤街办事处送去一批医用口罩、手套、防护服和医用酒精等紧缺物资；组织辖区爱心企业和善心企业家慷慨捐款、传递爱心。

我每天坚持自驾车辆来到潮江社区“坐班”，当志愿者，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吃泡面、盒饭，一同搬运爱心物资；还带头加入物资保供、测量体温、入户排查登记、健康码注册登记和发放物资等工作中，以政协委员的担当守护居民的健康。

生在汉江边，防汛是江堤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从1991年开始，只要有防汛任务，我都一定在堤上驻守。2020年汛期，为执行好汉阳沿江堤10+343—11+343处的防汛守堤命令，作为党员、政协委员、老防汛人员，我迅速组建防汛突击队，轮班值守。自上堤以来，我连续10天都在堤上轮班值守，时刻关注水情变化情况，即使是颈椎病犯了，也没有下堤休息，仍坚持在堤上督导巡堤查险。

没想到因为自己的姓名“宋武汉”而成为了“名人”，一篇《我的名字叫“武汉”，凭什么不来保卫她》的报道被人民日报、新



三位“武汉”共同巡堤（右一为宋武汉）

华社等多家媒体纷纷转载。“堤后就是家，洪水不退就不下堤”是我们三位名为“武汉”的守堤人的决心，我与众多平凡的战友们一起，发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武汉抗洪精神。

作为政协委员，最重要的是发群众声音，办为民实事，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强青少年假期托管的制度化建设、解决学校周边交通混乱问题、推动城中村改造企业的转型发展。作为企业负责人，我积极推进还建小区的改造工程，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从田间到高楼，三十余载光阴荏苒，风云变幻，潮江在时代发展洪流中日新月异。我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企业家的成长史，更是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

吧哒科技的破与立

◇ 陈立军（口述） 门霁雪 周曼玉（整理）

人物名片：陈立军，武汉市宁波商会副会长，武汉吧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时间的长河里，前浪、后浪，都不足以概括我们。当我们，成为新的我们。”这是2023年新员工培训会上，我对新入职同事的期许。当我们处于不断成长和进化的过程中，会发展出全新的自我，公司也是如此。

2024年是武汉吧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吧哒科技”）价值成长元年，我们迎来了新的业务转型之路，进行着从“想做自己”到“做自己”的蜕变，这是公司成立25年来的第四次转型，希望在“破”“立”之间趟出一条新路。

代理中起步，转型中蜕变

1999年，武汉四通创新集成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吧哒科技）在武汉市洪山区成立。公司创立之后逐步确定了以IT服务为核心的发展方向，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2009年公司成立十周年，陈立军在办公室留影

我们通过“员工持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公司注入活力，使其稳步发展并站稳脚跟。

初创期给我的印象就是焦虑，谋生存的焦虑。彼时我们就是一个单一卖产品的分销商，今天签到一个合同，明天接一个项目，脑子总在不断计算着，如此下去公司可以支撑多久。资金有限，经常是等着客户的账款交付上家的货款，货款到账才有机会发出当月的工资。与其说是工资，换言之是仅能维持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过我们坚信，只

要一味地走下去，不回头，就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公司借助于同大厂的合作，不断积累技术优化服务，逐步在行业内树立良好的口碑。2009年，我们首次提出转型，即从单一卖产品做分销转型到产品和系统集成。

2014年，集成业务和运维业务的销售业绩不断攀升，我们提出一个理念：交付即运维。公司进行了第二次转型：做运维。在此过程中，发现客户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数据不丢，业务不停。所以围绕数据不丢，业务不停，研发推出了信服易备 1.0 版本。

2017年《网络安全法》的颁布，数据安全是它的硬需求，推动了我们产品往前走；在2019年出台了“等保 2.0”，又把我们的产品往前推了一把；到2021年，公布了《数据安全法》，数据成为法人责任，又把我们这个产品推进了一把。

本着让产品变得更加完美，更加好用的朴素愿望，我们一路“打怪升级”，拾级而上，不知不觉中，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得到了加强。此时我们意识到，我们也可以做自己。

要做自己，必须筑高公司护城河。

2021年，“一种地址切换方法、装置、电子设备及存储介质”作为吧哒科技第一项国家发明专利正式通过。自此开始，吧哒科技不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进行研发，截至目前，吧哒科技相继通过了“数据管理方法、数据管理系统和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数据备份系统、方法及电子设备”、“虚拟机数据恢复方法、装置、计算机设备及存储介质”等42项国家发明专利……

悄然间我们实现了从代理商到品牌商的蜕变。

让医疗数据不丢、业务不停

线上预约挂号、手机取号拿药、自助下单检查、在线查询报告、药品直邮到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数字化转型，打造“一站式”智慧就医服务平台。患者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完成就诊全流程，诊前、诊中、诊后全覆盖。

早在2010年，我就意识到医疗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逐步率领团队布局医疗行业。当时大部分医院的信息化系统建设刚刚起步，缺乏专业人才，急需解决两个重要难题：一是如何保证医疗数据不丢失，得以长期保存；二是如何保障业务系统不中断，令业务平稳运行。

2017年，我们推出自研产品“信服易备”，该产品采用软硬件一体化配置，实现数据库、文件系统、应用、虚拟机等数据的备份和恢复，对核心业务数据以实时数据同步方式进行持续保护，在生产环境数据遭受破坏时，能快速响应业务系统的接管需求；同时具备生产环境重构和任意时间点数据自动恢复演练，提供安全、高效、全面的数据保护解决方案。



陈立军在吧哒科技2023年度新员工训练营上讲话

去年，我在拜访湖北某医院时了解到，因担心业务系统中断，该院信息中心主任感到非常焦虑，使用“信服易备”后，他再也无需假日期间往返单位，远程就可以实现系统的快速恢复工作。

还有次江西某医院因为建设信息化系统，不慎丢失全部数据，医院信息中心主任濒临崩溃，后来在我们公司工程师的帮助下，数据很快得以恢复。

“你们救了我的命”，事后那位信息中心主任的话深深触动了我，激励我努力做更好的产品服务客户。

截至目前，吧哒科技已服务 200 多家医院。医疗行业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往往涉及多个不同厂商、不同技术架构的产品，我们应该心无旁骛，多承担一点，解决客户信息化建设的后顾之忧。

除了医疗，我们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领域就是金融。吧哒科技作为优秀服务商，长期与武汉农商行、湖北银行、湖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武汉市住房公积金等省内金融机构开展密切合作，为筑牢金融数据安全底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成为 IT 服务领跑者

2024 年 9 月，吧哒科技自主研发的软件产品“四通信服易备数据安全软件 V4.0”成功入选湖北省首版次软件产品，这是该产品继荣获武汉市首版次软件产品认定后的又一殊荣。

除“信服易备”外，我们还结合客户信息化需求，推出“信服易云”“信服魔方”等多款自研产品，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一体化智能运维、IT 运维综合管理等服务。



2024 年，东湖数据安全创新联盟成立

目前，吧哒科技已拥有近 500 名员工，登记超过 100 项知识产权、40 余项发明专利，服务 1000 余家客户。在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我们希望用 25 年来积累的能力和对信息化的理解，更好地服务客户。

很多人问我公司为什么取名“吧哒”，“吧哒”的灵感来源于工程师坚定前行的脚步声，“吧”意味着提出需求，“哒”代表解决问题，一“吧”一“哒”则是事事有响应，事事能解决。

2024 年 4 月，在吧哒科技承办的“数安中国 东湖问道”数据安全创新大会（湖北）上，吧哒科技等 17 家单位发起成立东湖数据安全创新联盟，旨在搭建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多方主体合作交流平台，促进各方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与创新协同，实现联盟成员优势互补、功能联动与价值共创，共建数据安全行业发展新格局，形成数据安全行业新生态。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我期望联盟成员能在各自擅长的数据安全领域，充分发挥数据底座、数据中台、数据治理通力协作的作用与价值，以合力实现数据安全产业化，产业数据安全化，为建设数字湖北、数字中国贡献力量。

序战失利（上）：安庆与湖口战役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二

◇ 涂文学

安庆一天失守

武汉会战是以日军进攻安庆拉开帷幕的。

安庆位于南京与武汉之间，战略位置举足轻重。日军攻占安庆，一个重要的是利用安庆的机场，以更加便利快捷地对武汉实施空中打击。

1938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下达第101号大陆令，命令“华中派遣军以一部部队占领安庆附近”；紧接着又下达120号大海令，命令“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协助陆军占领安庆附近”。日华中派遣军一方面命令波田支队在海军第11战队的护卫下从镇江出发，沿江西上从水上进攻安庆，一方面则命令第6师团坂井支队从合肥出发，陆地行军南下攻占安庆，从而形成合围聚歼之势。

进攻安庆首先从陆路展开。29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长官畑俊六命令第13师团巩固对蒙城的占领，进攻凤台与寿县附近。6月2日，命令第13师团从蒙城开始行动。3日，13师团进逼凤台。4日，正阳关失守。5日，畑俊六赴庐州对第6师团坂井支队下达进攻安庆的命令，包括步第13联队、47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自合肥向安庆进发，虽然山路崎岖且下暴雨，天气湿热难耐。8日，攻陷舒城。13日，攻占桐城。14日，向西南进犯潜山，在潜山附近与杨森所辖146师和147师展开了激烈战斗。

水路方面，6日，畑俊六在镇江向波田支队下达进攻命令。次日，波田支队从镇江溯江西上，向安庆进发。海军华中部队第2梯队，亦于8日从镇江出发。9日，海军扬子江部队旗舰“安宅”号、军舰“嵯峨”号载特别陆战队从南京出发。海军华中部队第11水雷队各驱逐舰及军舰“势多”号、“八



1938年6月13日，日军从镇海门进入安庆

重山”号、扫雷艇及特别陆战队的一个中队，在大通水域扫雷清障。11日，海军集结舰艇140余艘、木船数百只，在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50余架侦察、战斗、轰炸机的掩护下，从芜湖溯江西进，运送掩护波田支队的一个步兵团，在距安庆20公里处的马窝子（东面）和大王庙（西面）分别登陆，从陆路向安庆包抄。12日下午，安庆机场失守。13日晚，波田支队攻入市区，安庆失守。

14日，日本《朝日新闻》用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所谓“安庆大捷”。头版刊登六条消息，是为报道“武汉攻略”战的第一声，讲述海陆军如何协同作战，在安庆城附近登陆作战成功。

第六版则详细报道日军攻占安庆的细节，内容大致如下：第一条：“我海军无暇休息，就开始向安庆上游进击。汉口危如累卵。”第二条：“光灿灿的安庆攻略战，海军精心策划半年。如此困难的事业在战史上没有先例。”第五条：“三天前进300公里。

神速！趁虚而入。”第六条：“泥泞连绵，难以想象的困难行军。”第十一条：“桐城攻略战速报：敌人顽强抵抗，出人意料的激战。”

和同日其他报纸对比一下，可知《朝日新闻》对“武汉攻略”报道的及时和版面之多均居榜首。（〔日〕邓红《从〈朝日新闻〉的报道看到的“武汉攻略”》，参见涂文学、邓正兵主编：《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P15—18）

在日军从合肥南下攻取蒙城、凤台、正阳关、大蜀山、舒城、桐城等地时，中国守军第11集团军第48军（李品仙部）、26集团军（徐源泉部）、27集团军（杨森部）133师做过一些抵抗。6—8日大雨滂沱，中国军队每隔几十米就挖一条约2米宽的壕沟，使日军特别是炮兵难以行进，但在敌军强大攻势面前，无不以弃城失地而惨败。

至于安庆，担任守卫任务的是杨森所辖第27集团军。早在当年1月，安庆市政府已迁往六安，至5月上旬，政府机关和一些稍有资财的市民都已撤出安庆，安庆已是一座空城。12日早晨，日军出动多艘舰艇向安庆城发动猛烈炮击，以掩护2000多日军登陆。守军“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迭次击退敌之攻势”。中午，敌舰增至20余艘，持续猛烈炮击安庆城。杨森所辖第134师与日军战舰相互炮击达两小时之久，下午3时，杨森先是移驻集贤门城楼，后又撤到集贤关观音洞。“入夜后其由安庆下游登陆江北之一部，亦抵达北郊。经我军奋勇阻击，予以重创后，即乘夜的潜山转进，安庆遂陷敌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19）

所谓“安庆战役”，日军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安庆。“在这次战斗中，日军绕过了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从后面进行了两栖登陆，很快就击溃了驻守在此的杨森的两支四川籍部队。可以说，日军在这次战斗中是智取安庆。安庆失守之后，杨森蒙羞而逃，从此杳无音讯”。（〔美〕麦金龙《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8年，P48）

安庆战役后，第五战区曾对此作如下总结：徐州会战甫告结束，敌即着手对我武汉要地之攻略，长江北岸之敌一〇〇、一三〇、一六〇等部先后在正阳关、合肥一带集结。六月六日，合肥之敌一部，开始南犯，同时长江敌舰二十余艘于十二日晨向安庆城轰击，掩护敌军二千余登陆，我守军节节后退，安庆遂于十二日失守。合肥之敌六月八日向杨森部之大关阵地进犯，经我军节节抵抗，十一日我转移至源潭铺附近，十五日转移至潜山附近，十六日晨敌迫县城，经

十六、十七、十八三日激战，潜山遂陷敌手。（《国民党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长江北岸之战斗经过概要》，参见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保卫大武汉——纪念武汉抗战六十周年专辑》，《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3期，P184）

马当要塞“固若金汤”神话破灭

夺取安庆后，日军下一个目标便是湖北的门户——九江。但要夺取九江，绕不开一个重要的江防要塞——马当。

马当，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北端的长江江边，与上游小孤山夹江相望，犹如扼喉之钳紧锁长江天堑。马当江上有沙洲将江面一分为二，洲北水道淤塞不能通航，南边一侧江面宽不及一里，为航行要道。因此，马当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马当周边，东有香山和黄山，西为湖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长江最重要的要塞有三，一为江苏之江阴，一为江西之马当，一为湖北之田家镇。因此，从1937年秋开始，江西省江防委员会未雨绸缪，抽调9个县民工费时近一年，努力营建马当防御工事。

马当防御工事，分岸上和江面两个部分。岸上部分，在马当山上建造了三级炮台，第一级在马当矶头，第二级在马当山腰，第三级在马当山顶。江面则在马当浅水道沉塞了大型商船9艘、大木船8艘；另有千余只木船满载石块，凿沉于江底，并布置水雷1600多枚。中国军队担任马当守备区指挥



1938年5月26日，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徐州

官的是江防总司令刘兴委派的李韞珩，具体担任马当要塞守卫任务的则是王锡涛任师长的第53师。包括香山、香口和马当在内，一共布置了第53师、146师、167师和499旅等部队，另配有海军陆战队和炮兵团，整个马当拥兵3万有余，意欲严防死守，不致门户再失。

日军在13日占领安庆后，马不停蹄向马当、湖口等地进犯。14日，日机36架分7批轰炸马当、彭泽、湖口、九江等地，此后18、19、20日继续多次轰炸。22日，波田支队数艘军舰驶至马当山水栅发动攻击，中日军队在马当山以北展开激战。与此同时，日军扫雷舰“利华”号载特别陆战队冈本部队约180人，搜索破坏江岸水雷敷设点，在茅林洲触雷沉没。马当要塞守军击沉日军汽艇3艘，日本侵略者气焰稍挫。23日，波田支队在大通以上江面集结大小舰艇200余艘。华中派遣军由长江下游、津浦线等处调集了大约20个师团，意在打开马当门户，为占领武汉扫清障碍。

24日，日军近6000人在20多艘军舰、100余只汽艇及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在香口登陆。此时，马当守备区指挥官李韞珩脑袋不知搭错了哪根筋，进行所谓抗日学校培训班结业典礼的迷操作。这个培训班6月10号开课，6月24日结业，正是日军暂时放弃马当而转攻香口、长山阵地的当口。李韞珩对此竟全然不知，突然下达命令按计划举行培训班结业典礼，并要求排以上军官都要参加，典礼后又举行庆祝宴会，喝得昏天黑地，整个香口、长山阵地处于群龙无首状况。凌晨2时许，日军一枪未发轻松拿下香口；



日军舰队溯江而上

5时许，又向长山阵地发起进攻。留守长山阵地的海军总队鲍长义率2000多人奋力抵抗，但寡不敌众，最后打得只剩下200余人，不得已撤退至马当要塞。

就在鲍长义死守长山之际，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命令第167师师长薛蔚英火速增援。部队距长山仅15公里，如果走大路，要不了一会儿就能到达。但薛蔚英没有执行白崇禧的命令，而是打电话请示李韞珩，说走大路危险，要求走小路，得到同意。哪知15公里竟然走了两天，赶到时阵地已易敌手。薛蔚英事后说是因为迷了路，是真的迷路还是有意拖延时间，只有天知道了。

25日，中国军队向香山、香口反攻。参加战斗的有从3战区增调过来的第60师第180旅，协同第16军第53师一部，在空军配合下，当日中午收复香山、香口。日军不甘失败，下午开始大举反扑，在付出战死189人、负伤385人惨重代价后，再次攻下香山和香口。

香山高于马当，可瞰制马当全境。日军占领香山后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在华阳、

黄山炮轰马当，同时派多艘汽艇在马当江面扫雷。守军炮兵猛击敌舰，击沉4艘、伤2艘。同日，守军先是放弃牛歇岭、老虎头及马鞍山，最后张公矶又沦入敌手，马当要塞失去最后屏障，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26日，波田支队在海军和飞机配合下，在娘娘庙、牛山矶登陆，施放大量毒气弹，马当要塞一个守备营全部牺牲。第167师的一个旅受命增援马当，但未到达。马当要塞王锡焄师长亲率5个营与日军血战，直至弹尽粮绝。上午9时，马当陷落。“中国方面先前在马当花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精心设计和构筑的防御工事，在没有经过任何正面抵抗之前就陷落于日军之手，实在是可悲。在解除了马当防御工事的威慑后，日军战舰在29日冲过江面上国民党军队先前设置的障碍物，在长江江面上自由游弋。马当失守，给中国军队的防守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为马当上游的九江已经无防可守了。事情发生之后，蒋介石立即责成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并准予处决马当防守的主要负责人——彭泽指挥官薛蔚英（此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就是这个薛蔚英，战前不顾总司令白崇禧电话的再三交代，对其他人要他加强马当防御以防日军突然袭击的警告不予重视，才酿成如此大祸”。（〔美〕麦金龙《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8年，P49）

马当失守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曾下令第15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率部反击，迅速攻占香山、马当阵地。28日和29日，第105师、316旅与

第60师、53师各一部，分别向香山、香口发动反击，但因日军过于强大而未果。

29日上午，波田支队和第101旅团猛攻彭泽，中国守军第16、56、60、105、167师等奋力抵抗，但在日军海陆空立体攻势面前，颓势顿显。当日，彭泽沦陷。次日，日军又攻占离彭泽西南6公里的定山。

从7月1日开始，日军猛攻湖口。湖口，顾名思义，为鄱阳湖与长江之交汇口，素有“江湖锁钥”之称。湖口乃九江门户，湖口若失，九江即不保，因此彭泽、湖口划归一个战区，在石钟山上设置江防要塞和炮台，并在江面布置大量水雷。

2日，19集团军司令官罗卓英曾与日军在流泗镇以东的棠山一带发生战斗，一度夺回流泗阵地，但旋即丢失。流泗失守后，湖口县城即危如累卵，难以防守。

3日，波田支队继续西进湖口。守军第77师461团与敌军交战，团长阵亡，伤亡官兵400余人。日军还使用毒气弹袭击龙潭山第26师一部，26师被迫撤至湖口。与此同时，“波田支队乘装甲汽艇向湖口强行



中国守军在马当要塞

登陆，鏖战两昼夜，我炮台守兵伤亡殆尽，5日湖口陷于敌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19）

17日，顾祝同对于马当、湖口失陷原因，转呈江防总司令刘兴电报予以检讨。刘兴认为有九点，归纳一下：一是马当守备区指挥官李韞珩不适时宜地举办所谓“抗日学校”，调集所辖部队官长三分之二受训，“对于实际战备，过于疏忽”；二是对于马当外围重要据点香山，本应派重兵把守，却“不加注意，致被敌轻易夺去”；三是对香山失守之信息隐瞒不报和妄报，事后又自信地以为“恢复香山，并非难事”，致使收复香山战机贻误；四是由于指挥不当，不服命令，以致藏山矶阵地丧失；五是马当要塞守备兵力太弱，“总计不过五营，且系混合编成，成分复杂，战斗力甚形薄弱”，而李韞珩又增援未至，“迄敌由娘娘庙登陆，一面迫近炮台，一面将藏山矶后路截断，致全被包围”；六是增援马当之53师之一部和167师驻湖口一旅，或按兵不动，或行动迟缓，马当守军孤军奋战，终被日军攻陷；七是武器装备落后，“薛师武器，曾经德国顾问检查，机枪迫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

至于湖口，刘兴总结失陷原因亦有七点，概而言之：一曰要塞守备部队“力量太弱”，武器装备亦落后，“湖口正面太宽，职申请以有力部队驻守，26师完全新兵，武器又劣，重机枪全无，轻机枪仅及半数，不能胜此重任，而终愈无其他部队。故开战三昼夜，湖口即告失陷”，而要塞炮兵亦“对江面设置，对野战军作战，完全不能支持”；二曰各参战部队有欠统一协调，致贻误战

机。原守湖口之第77师，在彭泽失陷后奉命收复彭泽，而向湖口推进的第26师正当半渡时其先头部队即“与敌接触”，而奉令增援的第77、16师“为敌牵制，迄未到达”，且第73军军长王东原与26师始终没有取得联系。而长江要塞守备部队在湖口危急时，竟称“奉命开往安全地点休整，致影响其他部队，咸感不安”；三曰“敌施放毒气，我部队毫无防毒设备及经验，致有惶惧失措影响战斗”。（《顾祝同转呈电1938年7月17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39—240）

日军占领湖口后，中国军队利用其自彭泽至湖口战线长（纵长45公里）、立足未稳的弱点，试图从陆上反攻湖口，先后发动了流泗桥、太平关、狮子山、黄土岭等战斗，一度攻克香山，击毙日第145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福岛橘马少佐。据有关战报和战史统计，日军攻陷马当、湖口付出代价惨重，日方统计波田支队战死470人、伤952人，总计1422人；而中方则指其伤亡人数逾3000人。

如前所述，马当为长江三大要塞之一，马当一失，武汉上游江防要塞只剩田家镇。马当、湖口失陷，事关武汉会战全局，日军向西可取九江，向南可渡鄱阳湖攻击南浔、浙赣两线，形成既掩护两翼又迂回包抄武汉的态势。有鉴于此，统帅部决心死守九江，以期亡羊补牢，挽回败局。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际盛：从黄陂到黄花岗的革命人生

◇ 彭 澎

唐际盛，1899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王家河三合店响山林唐村。1921年初，在武昌求学期间返乡成立乡村改进社，从改变乡村面貌入手改造社会。1922年入党，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合店特别支部和中国共产党三合店支部创始人之一。这是黄陂建立最早的中共党团组织。他还曾负责组建中共河南开封地方执行委员会并任书记，为河南地区党的创建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改造乡村到改造社会，从教育救国到投身革命。唐际盛在武昌徐家棚、江西安源、湖南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考取黄埔军校，参加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1926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广州，遗体安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公墓。

求学武昌参加利群书社

唐际盛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足的家庭，其父唐庆兴在乡里以写文书田赋表册为业，

人称“册书先生”，为人忠厚，深受乡亲敬重。母亲黄氏，温良贤德，通情达理，从小就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

唐际盛深受家庭氛围的影响，富有正义感。5岁进入当地青云庵小学，由于聪明好学、记忆超群，很快就完成所有课程。转入黄陂县道明高级小学后，不满校长宗次峰对学生的肆意辱骂，他带领同学抗议而被开除学籍。

1918年，唐际盛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学习，深受恽代英等人影响，走上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阅读《新声》《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大量进步书刊，积极参加互助社、日新社和利群书社等进步社团，逐渐成长为武汉学生运动的骨干。

五四运动一声惊雷，迅速席卷全国，唐际盛和日新社社员第一时间走出校园，参加由武汉学生联合会发动组织的示威游行，散发传单，演讲请愿，支援北京学生运动。

据《恽代英日记》记载：“5月18日，《呜呼青岛》传单来，同学分途散发者如下，张宜瑞、唐际盛……后宰门，大东门，芝麻岭，督军府。”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唐际盛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改造社会的信念。他利用暑假返乡机会，走村串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当地民众觉醒。暑假结束后，他又和卢斌等人深入厂矿创办通俗夜校，从识字开始，揭露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和压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进行反抗。他还认真总结五四运动的教训，提出斗争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争取各方力量，建立革命组织。为此，他与林育南、李书渠等发起成立“健学会”，以“改造自身、改造环境”为宗旨，要求会员必须恪守“实践、奋斗、互助、坚忍、俭朴”的信条。

1920年2月，在恽代英的倡议和筹划下，武昌地区的各个社团联合成立利群书社。唐际盛率先加入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0月，唐际盛、吴光荣、卢斌等8人被派往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习，被称之为“两湖文化携手”。在湖南，唐际盛结识“文化书社”的毛泽东、易礼容等人，深受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曾在一篇日记中说：

“……欲根本的改造中国，非从小学生改造起不可。……有志于改造社会之人必须投身教育界。”

深入乡村尝试教育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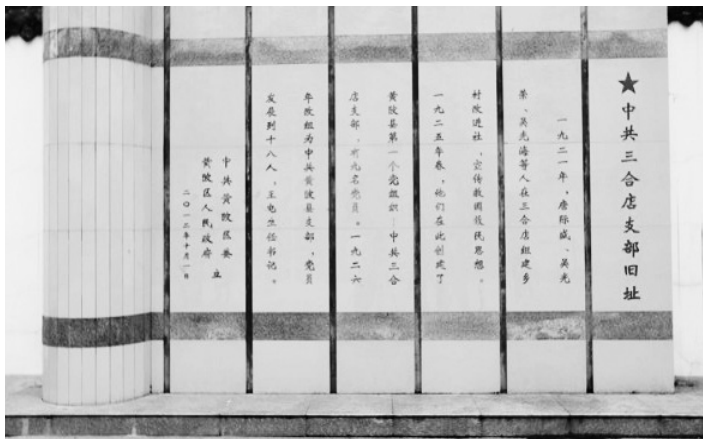
1920年底，唐际盛和吴光荣返回黄陂，以黄陂东乡青平小学为基地，通过乡村教育唤醒国人。

1921年初，唐际盛与吴光荣、王电生等回到黄陂王家河三合店青云庵小学，成立乡村改进社。主要目的是团结青年知识分子，在乡村办农场、林场、畜牧场和兴修水利，改善乡村环境，改进乡村落后的生活方式，传播新思想，改变社会面貌。这在当时全省农村可谓首创。

乡村改进社通过向社员推荐新书刊，宣传新文化，提倡新教育，编演文明戏，社员由10余人发展到160多人，逐步由一个进步团体发展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为黄陂党组织的创建作出理论和干部的准备。社员后来大多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唐际盛应邀赴黄冈创办浚新小学，在任校长期间亲自编写乡土教材，注重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实施“实地观

察，野外生活，自治互助，乡村实用，注意学生的成就”一套新教学方法，深受当地劳苦大众的好评。林育南曾回忆唐际盛“在黄冈乡村，空手赤拳创办浚新小学，作农村运动，深受劳苦农民的赞许。他惨淡经营，与旧社会恶势力奋斗，饱尝了一切的艰难困苦。他除了对外奋斗及教学、训育之外，还要与学生共同工作——耕田、种园、筑路、挑水等等。……因年荒无米，只能每日二餐……”



中共三合店支部旧址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能够迎难而上，放下“架子”到农村办学，其精神和做法是难能可贵的，在客观上起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作用。

通过几年的研究比较，唐际盛和利群书社的社员认识到，在军阀林立的时代，通过教育救国只能是幻想。同年7月，共存社成立，带有共产主义组织的性质，唐际盛被公举为共存社总务股委员。他提出“以积极切实的准备，企盼阶段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标”。1921年底，获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共存社随即解散。

辗转南北创建党组织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1921年10月，唐际盛离开浚新小学，与林育南、李书渠等一起加入中国劳工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中。他被派往粤汉铁路徐家棚车站后，改原来的平民夜校

为工人补习学校，创办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子弟学校，引导铁路工人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把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组织工人运动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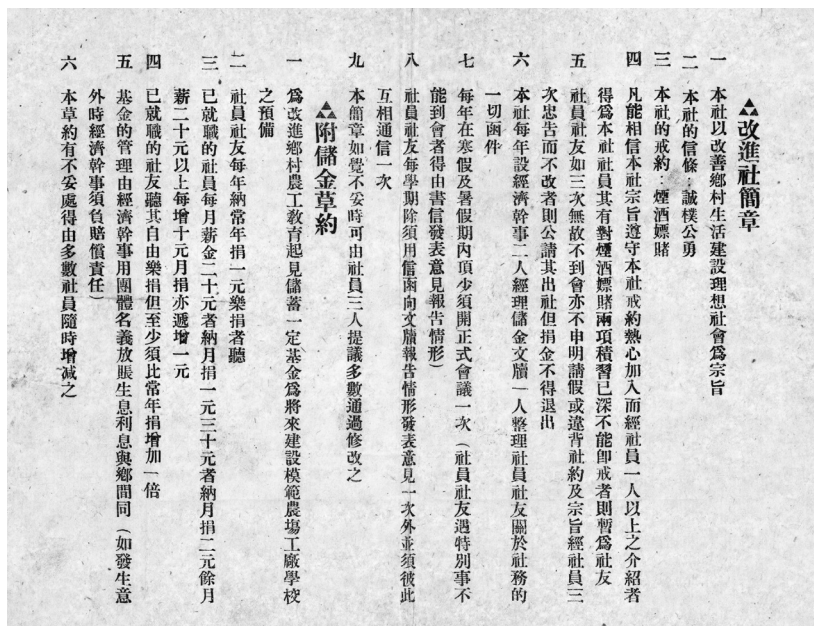
在林育南的积极动员下，唐际盛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青年团武昌地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和社会教育委员会委员，1922年由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吸收为共产党员。从此，他和林育南、李书渠等成为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唐际盛根据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在乡村改进社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积极发展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不久，受武汉党团组织的派遣，赴江西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任路矿工人夜校主任。他团结同志，工作勤奋，边向工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边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安源路矿工人之伟大组织》，指出“空文的章程和形式的组织，亦不一定能有力量，必须还要有纪律”，较早提出构建严密

组织体系，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在工人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共鸣。

3月，毛泽东决定派唐际盛、贺恕、朱舜华、毛泽覃四人到湖南水口山加强领导。这张照片经与黄陂区档案馆的专家及唐际盛的侄孙反复沟通考证，确定为当年4月摄于湖南水口山，一起合影的人物为唐际盛、贺恕、朱舜华、毛泽覃、蒋先云。此间，唐际盛书信用的信笺，即是“水口山工人俱乐部”。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



《乡村改进社简章》（黄陂区档案馆馆藏）

开办黄埔军校。唐际盛由恽代英、韩觉民保荐投考黄埔军校。5月到广州，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学习。然而，因劳苦过度身患肺病，被迫中途辍学。在返回王家河养病期间，不顾病魔缠身，指导乡村改进社的活动，领导黄陂的党团组织与以余家菊为代表的“孙文主义学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黄陂产生较大影响。

1925年春，根据中共武汉党组织安排，唐际盛从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他联合吴光海、王电生、吴光谟等骨干共产党员，创建黄陂第一个党组织——三合店支部，书记王电生，隶属于武汉地委。次年，改建为黄陂支部并组建黄陂县部委员会。三合店支部的诞生，改变了黄陂的革命面貌，并很快向周边地区辐射，派出年轻党员王鉴到黄安从事农运工作，播下了革命种子，为后来震惊全国的黄麻起义做出准备。

5月，根据中共四大指示，唐际盛被派往河南郑州从事党的创建工作，公开职务为国民党郑州执行委员。由于开封党组织遭受重大挫折，剩下的党员全部转入地下工作，形势十分严峻，但他不顾旧疾复发，全身心投入工作。白天，他参加国民党河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国民党右派据理力争，面对国民党右派公然在选举中舞弊而愤然离席。晚上，他拖着孱弱的身体，走访书店街、南关和开封省立一师，深入了解建党组织的筹备工作。在与同志交谈时，他依然咳喘不停，随身携带的手帕已经满是血丝。据“开封党史大事记”记载：“在开封，唐际盛住在南关一个小旅馆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多年为革命劳苦奔波，他的肺病复发了，经常吐血，



唐际盛（中）与战友在湖南水口山

为了不给同志们带来麻烦，常把血吐在手帕上。就这样地坚持工作，其精神为党内同志深深感动。”

6月，在夏日的骄阳中，中共开封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唐际盛任书记，直接隶属中央（具体受特派员王若飞领导）。这是河南地区最早成立的地委组织。

1926年1月，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唐际盛、冯品毅代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又以河南省农民协会代表的身份，参加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后留任在惠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党务科长，准备北伐。6月14日，唐际盛病情恶化，病逝于广州公立医院。熟悉和了解他的革命者痛惜不已，林育南撰文悼念，称赞他是“最忠实、最勇敢、最努力”的同志。

彭澎，武汉市黄陂区委党校讲师

梁启超 1922 年武汉演讲佚文

◇ 肖朝晖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自 1917 年退出政坛后，梁启超专心投入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周游各地讲学。

1922 年 4 月起，梁启超除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美术学校等京城多所学校和学术团体演讲外，还先后赴济南、南京、上海、南通、长沙、武汉、开封、天津、苏州等地讲演。这些演讲活动，《梁启超年谱长编》均有简略记述，而长沙、武汉、开封三地的情形，又有李永春、李明、金传胜等人专门考述，弥补了其记述“甚简”的不足。^[1]

梁启超 1922 年赴汉讲学，是应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主持的暑期学校（以下简称

暑校）之邀，讲学情形经李明的细致考辨已基本清晰，然而仍存有遗漏。最近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一篇梁启超 1922 年武汉演讲记录稿，题为《研究哲学的方法》，未被 2018 年新版《梁启超全集》及《〈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收录，是为梁启超演讲佚文。今整理如下，以供学界参考，并略陈该演讲记录稿的文献和学术价值。

《研究哲学的方法》^[2] 原文实录

今晚承哲学社请我演讲“研究哲学的方法”，我平日对于研究哲学颇有兴趣，所以很想作长时间的演讲以答诸君的厚意，无奈这几天讲演太多，又忙于应酬，精神疲倦极了，实在不能多谈，只约略言之吧！

誌 雜 燈 覺

講演
究哲學的方法

研究哲學的方法

梁任公在武昌哲學社演講時 簡策雍筆記

今晚承哲學社請我演講研究哲學的方法；我平日對於研究哲學，頗有興趣，所以很想作長時間的演講，以答諸君的厚意。無奈這幾天講演太多，又忙於應酬，精神疲倦極了，實在不能多談，只約畧言之吧！

近幾年來中國青年多半熱中於改造社會，但是社會依據古來的舊道德、舊風俗、舊禮教、舊制度……已經根深蒂固了，我們很難改造的，就是許多青年，多方破壞，不過動搖一部分的表面罷了，依然不能達到澈底的，全體的改造，那些要改造的根本的改造須從何處下手呢？我以為著手的地方，必須先從思想改造起。因為思想的勢力，能以支配個人，能以支配社會。若對於舊思想能

以改變面目，對於舊禮教、舊制度……自然抱懷疑的態度；從懷疑的態度，必想設法改革；於是舊社會不用大力攻擊，自然瓦解。

而新社會就可因此建造出來了。由此看來，社會改造的先決問題便是思想改造。思想如若沒有改造，社會就不會達到極度的、完美的改造。中國近幾年來，改造社會的熱度很高，而實際的效果很小，我想，就是因為這個原故。說到這裏，諸位一定疑問：思想如何改造呢？那裏要圓滿答覆這個問題，就不能不「乞靈於哲學」了。因為什麼呢？因為哲學是總合的學問，也就是一切思想的總匯。試看西洋的社會變遷，學術更新，無不賴中國哲學的支配。可見哲學的勢力，是很雄厚的。受過三三年來，學界對於研究哲學，所以很有濃厚的興趣，想必是受了這個影響。國人既然對於研究哲學，很有興趣，那麼，研究的方法，就不能不注意了。因為凡研究一種學術，或辦一樁事務，總

近几年来，国中青年多半热中于改造社会，但是社会依据古来的旧遗传、旧风俗、旧礼教、旧制度……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很难改造的。就是许多青年多方破坏，不过动摇一部分的表面罢了，依然不能达到彻底的、全体的改造。那吗，要想根本的改造，须从何处下手呢？我以为着手的地方必须先“思想改造”起，因为“思想”的势力，能以支配个人、能以支配社会。若对于旧思想能以改变面目，对于旧礼教、旧制度……自然抱怀疑的态度，从怀疑的态度，必想设法改革，于是旧社会不用大力攻击，自然瓦解，而新社会就可因此建造出来了！由此看来，社会改造的先决问题便是思想改造，思想如果没有改造，社会总不会达到根本的、完美的改造。中国近几年来改造社会的热度很高，而实际的效果很小，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说到这里，诸位一定疑问“思想如

何改造呢？”那吗，要想圆满答覆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乞灵”于“哲学”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哲学是总合的学问，也就是一切思想的总汇。试看西洋的社会变迁、学术更新，无不受哲学的支配，可见哲学的势力，是很雄厚的。中国近二三年来，学术界对于哲学研究，所以很有浓厚的兴趣，想必是受了这个影响。国人既然对于研究哲学很有兴趣，那吗，研究的方法就不能不注意了。因为凡研究一种学术或办一样事体，总要有完善的方法，才能进行顺利、取得良好的效果。不然漫无头绪，恐怕是徒劳而无功咧！西洋近百年来，学术所以能有惊天动地的进步，虽说原因很多，但是最大者是因为他们的“方法完善”。中国学术所以没有长足的进步，不用多说，是因为“方法不好”。从此可知，“方法”对于研究学术的关系是何等的重大哟！现在闲话说的很多了，下面就讲“研究哲学的方法”吧。研究哲学的方法，我想约有三种。

(一) 问题的研究——哲学的范围，既然广大无极，故所包含的问题，自然也多了。但是人类智识有限，不能把这些问题研究无遗。且所研究的，未必有圆满的解决。所以哲学上问题固然多，而研究的精粗及多寡，必随我们智力的高低而定。古代人民智识浅陋，只知注意外界事物，故那时哲学思想很决浅俗。西腊哲学的鼻祖，色莱斯以“水”解释宇宙问题就是一个明证。后来智力大进，所注意的事物渐渐由外向内，所解释的方法，也渐渐由浅入深。于是伯拉图以“观念”的影像说明万物的实体，而亚里士多德以“形质”的关系解释一切事物的变化。他们二人与色氏一比较，就可知道研究哲学上的问题，真是随人类智力而进步的。其余例证很多，不暇枚举。请诸位看看哲学史，

即可明白前后变迁了。哲学上的问题，既然很多，我们将何从研究？那吗，我们为时间精力所限，绝对不能把这些问题研究完全，所以须就自己所最爱研究的某一问题，明其意义、溯其原始，以忠诚的态度，彻底讨论之。例如研究“性的问题”，有个哲学家主张性“善”，有个哲学家主张性“恶”，有个哲学家主张性“不善”“不恶”，我们应该怎样解决呢？须先解明“性”的意义及范围，然后看看他们所指的性之意义及范围是否相同？要是不同，不同之处在那里？不同的理由是什么？把这些问题精确解决以后，方可评定他们所主张^[3]的，那个是对，那个是不对。像这样研究“性的问题”，尚可得到圆满的解决，而有真正的价值。若不按以上的步骤，信口争辩、任意判断，那是毫无意识的。所以研究某项问题，首先就要解明其意义及范围，进而考察此人所说的意义及范围和他人的说法是否相同，然后再讨论他们所主张的不同，孰是孰非？研究问题的方法大约不外乎此。

（二）派别的研究——这位哲学家和那位哲学家的“天性”不同、“见解”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所承受的“思想”不同，所以对于宇宙事物的意见及主张自然不能一样的。他们的见解及主张既然各不相同，于是分门立户，派别就产出了。我们研究这些派别必须观察他们来龙去脉及其影响。例如孔、老二派同生于周末社会^[4]乱、政治腐败的时代，为什么孔子主张“和缓的改良”，而老子主张“极端的革命”呢？孔子影响于社会，为什么大于老子呢？以上种种原因，必有个起落的痕迹，认清这些痕迹，再解剖他们学说的精髓，才可迎刃而解。于是各派的真精神，自然显露出来，而评判各派的价值，也不至于有所偏重。再拿西洋“唯

心”“唯物”两派来讲，唯心派主张无物能离精神而存在；唯物派主张惟有物质是存在的。这两派既立于反对地位，很有研究的趣味。研究时总是先观察两派的眼光若何？态度若何？次而探求他们学说的精髓在那里，影响于社会及学术什么样？最后再看各派从古到今变迁的大势。我们研究几派的哲学，是用这样的方法；若研究一派的哲学，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三）时代的研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环境、时势，环境及时势一变，那吗，学术思想自然随之也变。学术思想环境……既然都已变更，这个时代必有这个时代的特别色彩，所以古今中外，一代有一代特色及精神。哲学既然是各种学术的总汇，必能代表一代之精神。试看周末战国的哲学和汉朝的不同，汉朝的又和唐朝的不同，唐朝的又和宋明的不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何处，他们不同的原因是什么？都应当特别研究之。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背景，哲学思潮往往由背景而发生。若不能先明其背景何在，就难知道这个时代哲学的源流，源流不明，便不能懂得其真精神及其归宿。比仿研究宋明理学，先须考察宋明思想受什么影响？那时代的状况若何？时代的环境若何？详细考察以后，方才明了宋明理学发生的渊源及其本质。最后再评量其在社会的价值，也不至于有轻有重。用这种方法去研究一时代的哲学，方可探清他的起原、组织及其作用。

以上三种方法，并非各自独立、不相为谋，且而互有关系、相辅而行。设如研究这个时代的哲学，就不能不研究这个时代的派别及各派所讨论的问题，其余可以依此类推，无须多说也可知道了。在座诸君想必对于哲学很有趣味，请将这三种方法择一而

试用之。时间很短促，说的很简略，请诸位原谅原谅！

《研究哲学的方法》三重价值

《研究哲学的方法》刊载于《觉灯》杂志第1卷第1期，出版时间为1922年12月，系梁启超1922年9月4日在武昌哲学社演讲的记录稿，记录者为简赞雍。简赞雍为当时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以下简称武昌高师）学生，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有一定研究心得，曾在《觉灯》《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刊载此记录稿的《觉灯》杂志，由武昌高师豫籍同学会编辑发行，杂志命名取以“自己底觉悟明示他人”之意，主张以考信、研究的批评、实利为宗旨和方法研究“一切学术”，设有论说、研究、演讲、译述、文艺、调查、杂俎等栏目，简赞雍为该同学会正干事。

演讲伊始，梁启超表示由于多日忙于演讲和应酬，精神疲倦，不能多讲。据李明考辨，梁启超1922年8月29日由宁抵汉，次日晚在暑校讲演，演讲结束后赴长沙；8月31日—9月1日在长沙；9月2日下午回汉，当天晚上演讲；9月3日上午和下午分别在黄鹤楼及抱冰堂参加欢迎大会，晚上在暑校观看易俗社演戏；9月4日当天活动亦颇密集，上午参加太虚法师佛学院活动，并在暑校讲演。^[5]可见开场白中“这几天演讲太多，又忙于应酬”所言非虚。

随后，梁启超由社会改造谈到思想改造，认为社会改造的先决条件是思想改造，思想不改造，社会改造不能成功。在他看来，思想改造须从哲学入手，盖哲学是一切思想的总汇，对社会变迁、学术更新有着深刻的



青年梁启超

影响。故研究哲学成为改造思想进而改造社会的前提性工作，而学术研究良好效果的取得离不开“完善的方法”。他进而向听众介绍了研究哲学的三种方法：问题的研究、派别的研究和时代的研究。所谓“问题的研究”，乃就哲学史上的某个问题，如“性的问题”，“先明了其意义及范围，进而考察此人所说的意义及范围和他人说的是否相同，然后再讨论他们所主张的不同，孰是孰非”。所谓“派别的研究”，如中国哲学史上的孔、老学派和西方哲学史上的“唯心”、“唯物”两派，“观察他们来龙去脉及其影响”，“探求他们学说的精髓在那里，影响于社会及学术什么样？最后再看各派从古到今变迁的大势”。所谓“时代的研究”，如研究宋明理学“先考察宋明思想受什么影响？那时代的状况如何？……最后再评价其在社会的价值”。最后，梁启超强调，这三种方法并非各自独立、不相为谋，而是互有关系、相辅而行，也就是说在研究哲学时三种方法可同时兼用。

梁启超治学特别重视学术研究的方法，

对此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至于研究哲学的方法，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儒家哲学》中有所揭示，即问题的研究法、时代的研究法和宗派的研究法。^[6]《先秦政治思想史》为1922年10月至12月间在东南大学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讲义，《儒家哲学》为清华国学院讲课稿。

基于此前已有的文献资料，学者一般认为，梁启超问题、时代和宗派研究法，是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中提出的。陆信礼在分析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探讨时指出，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具体操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注重从多种角度切入，具体表现为从问题、时代及派别的角度进行演述，“在《儒家哲学》与《先秦政治思想史》两书中，梁启超曾对此三种研究法作了专门说明。”^[7]而本演讲记录稿表明，问题、派别和时代三种方法，在1922年9月时即已提出。梁启超后来关于这三种方法的思考更趋成熟与完善，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如《儒家哲学》等。问题、时代和宗派，成为梁启超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标志性方法。

由上所述可知，本次演讲在梁启超学术思想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其问题、时代和宗派研究法三种方法的首次提出。就文献和学术价值而言，一可以丰富梁启超1922年武汉演讲的史实；二可以增补《梁启超全集》“演说”部分的内容；三有助于明了梁启超问题、时代和宗派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前后脉络。

注释：

[1] 李永春，伍安：《梁启超1922年长沙讲演述评》，《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2010年第4期；李明：《1922年梁启超武汉讲演考实》，《近代史学刊》（第1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金传胜：《梁启超1922年开封演讲考实》，《汉语言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2] 梁启超演讲，简赞雍笔记：《研究哲学的方法》，《觉灯》第1卷第1期，1922年12月，第102—105页。

[3] 原文如此，“张主”应为“主张”。

[4] 原文如此，“纹”应为“紊”。

[5] 李明：《1922年梁启超武汉讲演考实》，《近代史学刊》（第1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3—124页。

[6] 参见梁启超著、俞国林校《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22年，第19—20页；梁启超《儒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5页。

[7] 陆信礼：《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01页。

肖朝晖，武汉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

新发现张难先给李春萱的信

◇ 罗时汉

“甲申（三十三年）七十一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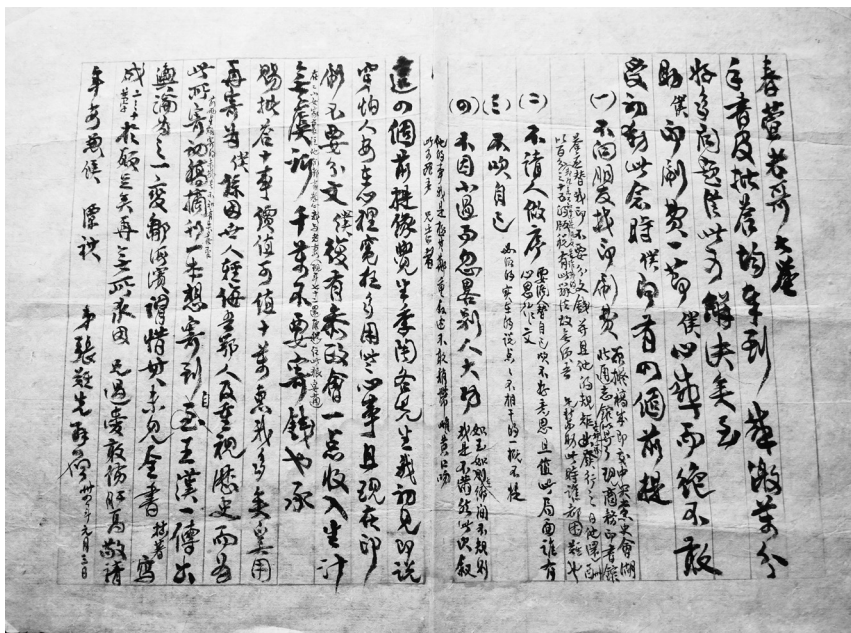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十六日，接李君春萱由滇来函，云余著述苦辛，拟汇赠国币五千元以助印费。当报书，谓余发念时，即决定四则，一，不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李君由是作罢。”

张难先所记是怎么回事？

当时，抗战尚未结束，张难先避居重庆，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编撰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上，孜孜不倦地撰写《丙午湖北党狱汇记》《湖北革命知录》等书，并不断求证求教于诸多辛亥志士。

李春萱（号作栋）时在昆明，曾任曲靖救济公署主任，也从事辛亥革命文史著述。重庆昆明之间的两地书不少。两人同为沔阳籍，交情甚笃。张难先年长14岁，算忘年之交，仍对李春萱以“老哥”“乡兄”“大哥”相称，知己情谊在书信中生动体现。

据李春萱孙女李良丽介绍：解放前夕，爷爷李春萱及其弟李秉纬前往香港，后李春萱回到武汉，将一包资料留在香港。李秉纬去世后，其女1980年代初回武汉时，将这些资料带给李良丽家，其中有张难先给李春萱的几封信，一直没有示人，此次为首次披露。



1945年1月3日，张难先致信李春莹

见即说穿，怕人安在心里冤枉多用些心事。且现在印刷不要分文，仆复有参政会一点收入，生计无虞（在二小女家里住，他们都省孝心，我与老妻现年七十二，还康健住此很安适），祈千万不要寄钱也。承赐批答十事价值可值十万惠我多矣，奚用再寄。为仆系因世人轻侮吾鄂人及重视历史而为此。（前两星期寄的未挂号不知有失落否）所寄初稿摘刊一本想寄到。自王汉一传出

这封信写于1945年1月3日，全文如下：

“春莹老哥大鉴，手书及批答均奉到，感激万分，好多问题从此可解决矣。至助仆印刷费一事，仆心感而绝不敢受。初动此念时，仆即有四个前提：

（一）不向朋友找印刷费。原拟稿本即交中央党史会、湖北通志馆各抄一份算了。现商务印书馆答应替我印，不要分文钱，并且他的规矩发行之日他还酬以百分之十五的版税（我原来不知道还是朋友告诉我的）。有此办法故无须吾兄帮助。此时谁都困难也。

（二）不请人作序。要阔人替自己吹，不好意思，且值此局面谁有心思作文？

（三）不吹自己。必须的实在说点点，不相干的一概不提。

（四）不因小过而忽略别人大功。如玉如在乡间不规则，我是不满，然此次叙他的事，我是极其郑重，不敢稍带雌黄口吻，此可（两字难辨）兄告者。

这四个前提像觉生、季陶各先生我初

舆论为之一变，邹海滨谓惜其未见全书。拙著写成二三十万字于愿足矣，再无所求。因兄过爱敢务肝鬲，敬请年安兼候 潭祺 弟张难先拜启 卅四年元月三日”

此信显然是在所著付印之前所写，直接谢绝李春莹的寄钱，可见张难先的态度和心境。此后，张难先还就修史问题与李春莹多次鸿雁传书。

一次是“二月十四日”：

“春莹老哥惠鉴：上月廿九日手书及航快，大著俱奉到快慰矣。似能俯纳鄙意，停止汇款，免仆听外人闲话，极为感荷（商务馆印交涉已妥不要分文）。刘玉堂事甘绩熙持之最力，仍写于十月初六日（两人同在一起）。因甘既有直接关系当然从之。仆已为玉堂作一传，载汉阳战事篇后，虽斌朱舜卿已来一详细经历，李君健广已载入汉口阵亡烈士名录中，有传请速寄来。大著已读毕，‘辰密电码’乃最有价值之史料，仆所收稿件从未见此，即当补入。其余有误者当照大著更正。如孙武失慎都说轰炸。南湖过夜都



1945年2月14日，张难先致信李春萱

说君与芮三在炮队，如此等等当遵大著改正。惟军令部长各书都载为杜锡钧，畏三当时是副参谋长，黄兴走后杨开甲辞职始升参谋长。黄兴同事君所举四人耿伯钊亲对。仆言辛亥年他未回湖北。范腾霄是汉阳失的那天他才由日本到武昌。刚刚开会他极反对弃武昌（他本人信说得极详），张君怀如谈起此事说得极高兴。蒋作宾一到武昌，大家疑他车身就走了。胡玉斋六十谈往言之鉴之，此数事卖点不知吾兄以为何如。拙录预备十日后即送印，附同，敬请春安急候 阖府清吉 弟张难先 拜启 凡例后序呈卿 二月十四日”

此信与油印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凡例”连在一起。而同为油印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后序”前面写的是：“这篇后序仆是有苦心在中，正文只能叙事不便谈闲话，故用一后序点睛，藉以明是非、吐郁气。谨以此就正难先再拜 二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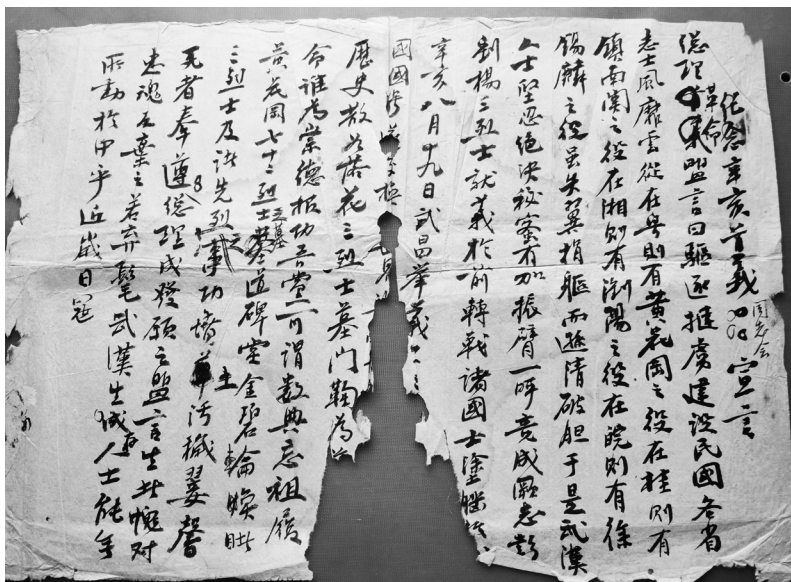
所著印行并非那么容易，张难先“三月五日”的信反映了后来状况：

“春萱乡兄赐鉴：拙稿‘凡例’‘后序’谅达，后序虑于时忌者，多劝仆删去峻词，仆亦不愿启意气之争，只求事实流传，正着手修改耳。拙稿已于日昨送商务印馆去印，据云须半年乃能出版，并且党部审查快慢难知，诚哉其不易也。出版后定当就正。李烈士继广传如在本月寄来，书局方面或可增入，迟恐碍难，希速寄。我拙录传状碑志共载六十余编，皆注重烈士武阳夏三役殉国者，苟知略历，虽士兵亦为

之立传，并郑重作一万余‘无名英雄传’，此稍可告慰同志者。大著稍缓即挂号璧归，谨此预告。敬请 春安 弟张难先 拜启（铃印）”

时过境迁，修史是艰难的。张难先此前的信中展现初稿目录：“再仆查武阳夏死难记有姓名者只廿九人，自应为某等作传。可以下笔者仆已作十人。维记载太略，则无法。笔开单于后，如兄之请，示知以便办理（下列20多人名单）……这些人皆应查明作传，请兄就知道的批于巷间示。”

还有一纸写道：“我再（仆）查武阳夏死伤人数总在万人以上，都是不知姓名者，欧美最重视无名英雄，我们太忽略了。我此次想替他们作个无名英雄传，维这篇文章要作得有声有色才好。我素来未用大功不敢动手，已请一个朋友作去了，用得与否则再说。再沙防营有一个叫陈滔的，号洪度，河南南阳人。辛亥在汉口刘家庙极出力，受伤愈后黄陂派他到滦洲（州）运动军队，暴动被杀，并剖其腹。后胡鄂公把他尸运鄂，



李春萱“纪念辛亥首义同志会宣言”残稿

葬于荆州城南门楼，即以其字易楼名，以资纪念。此事乃黄维亚告诉我者，不知兄有所闻否。我已为之作传，仍想多找一点材料（还有刘丹述的也未找着），尧（一字不清）厚载不可以无传。他们的行状到处找不着，不知兄处有否。时局大难，总想赶早付印以免佚亡。拙作好坏不敢说，总算尽力以赴费了两年苦功，足供后来参考耳。难先又及 同日半夜”

“同日”不知是“二月十四日”还是“三月五日”，也考证不清它是附在哪封信中。

李良丽提供的原件中，还有张难先的两帧墨迹，具体时间不详，故只能展示于此，有待专家研究：

“再，十二月廿二日曾奉拙著‘湖北革命知之录初稿摘刊’一册，年来总未提及，不知收到否。因一共五十份都未挂号，别处似皆接到。摘刊中是‘自序’、‘目录’、‘首篇’、‘王汉传’、‘考证三篇’，请查之。难先又及。”

“武昌首义与张之洞督鄂去鄂及其死”油印文章上，墨笔眉批：“再前应‘湖北论坛’

双十节之征，特草此文敬就春萱老兄正之 难先又及。”

从信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古稀之年张难先锲而不舍的修史经过，以及他与同仁坦诚相见的君子襟怀。至于信中所提及的辛亥志士，相信两人之间多有交流补充，以使其事迹更完整地写进史籍。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翌年再版于上海。该书“共进会始末”中会员名录有“李作栋，春萱，沔阳。起义后，任

财政部长。”“武昌首义之发动”中有“就汉口总机关部设政治筹备处，孙武、潘公复、李作栋为常驻政治筹备员”等内容。还附有李春萱所作“李继广传”。

“怅念先烈，中来悲戚。乡邦触目，循用典型。长者怀思，少者兴奋。于是设鄂州之会，有纪念首义之言。”李春萱“纪念辛亥首义同志会宣言”残稿，也是他们心迹的宝贵见证。

（李良丽供图）

罗时汉，长江日报主任编辑，文创一级，武汉地方志人才库专家

中共五大开会地点考

◇ 田联申

中共一大至四大，至今还没有看到会议照片存世，但五大有照片存世，瞬间留住了历史。

2016年，武汉革命博物馆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到“中共五大开幕式现场”与“中共五大开会期间”两张照片，“是仅有的反映中国共产党早期党代会的照片，填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缺乏影像档案的空白”，意义重大。

中共五大是在两个地点举行的，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主要会议、闭幕式在汉口黄陂会馆。两张照片背后的俄文标注，均为“1927年4—5月中共五次代表大会”，没有具体标注为武昌或汉口，本文试作解析。

开幕式：武昌一小

武昌第一小学即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武昌都府堤。1913年创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系武汉大学的前身，



1918年的武昌高师附小，1925年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此合影（武汉档案馆）

1918年其附属小学新校舍落成，为一层楼悬山顶结构、两面坡布瓦建筑，有照片存世。1925年7月，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举行，代表合影照背后也系一层楼建筑。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昌后，附属小学改为省立武昌第一小学。

五大代表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写道：

“四月底至五月初，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日开幕礼是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的，校长王觉新是同志，他穿着西装招待来宾和众代表。这日，我奉了使命，领国际代表团过江到武昌去……这一日大会完全是仪式。陈独秀当主席，致开幕词。国际代表团各人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代表致祝词。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即项德隆）领了一队纠察队进会场来行礼。国民党，除徐谦外，还有谭延闿和孙科，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不说话……刚刚宣布开会后，湖北省代表团主席罗章龙就站起提出主席团名单……这个名单通过了，蔡和森当选为大会秘书长。

武昌开大会也带了一种烟幕作用，因为第二日第一小学就没有代表踪影了，会场已移过汉口来，设在近郊外的黄陂会馆。从开幕式至大会真实开始工作，中间还隔了几天。”

郑超麟的回忆表明，开幕式上总书记陈独秀致开幕词，而不是作报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中，源自俄文稿的《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日期为4月29日，报告通常是事先拟好的。



五大开幕式武昌会场

这张坐满会议代表的会场照片，房顶为中国传统人字结构木梁，木梁上挂满了彩旗和灯笼，系一层楼房屋，没有天花板。与我们能够看到的同期武昌一小的照片相符，笔者认为此系开幕式照片。

主会场：汉口黄陂会馆

开幕式后，会场迁到汉口济生三马路（今自治街）的黄陂会馆。黄陂会馆1933年设黄陂小学，1958年改为武汉双洞门中学，文革中更名为武汉红卫中学，现为武汉75中学。

《郑超麟回忆录》写道：“最令我气愤的，是汪精卫来大会演说的一日。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的。”

郑超麟此段话表明，挂孙中山像的开



五大汉口会场，纱厂女工代表张金宝（前排右2）在主席台上

会地点是在汉口，会议开了几天之后，因汪精卫到会讲话而挂，武昌开幕式没有挂孙中山像。

人的记忆总会出现偏差，这一张照片显示汉口会场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没有挂到旁边去，而是从上至下分别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带木质边框的像。以图证史，有图有真相，一图胜千言。

1961年我读小学4年级暑假时，随同大陆里15号的小伙伴范正伟，去过一次双洞门中学。他去学校取来自苏联中学生的信——那时时兴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学生通信，见校门口墙上有一块“中共五大旧址”的木头牌子。

今年看到一张早于1961年的双洞门中学的照片，墙上有“万岁”二字，前面或有“总路线”三字，即“总路线万岁”。这个口号产生于1958年，双洞门中学也是在这一年由小学改为中学的。两栋二层楼楼房的左边一栋，挂着双洞门中学的标牌，有人说二层楼是原黄陂会馆。

双洞门中学的这个大门，对着后面三层教学楼中间的走廊，疑似新教学楼落成后在黄陂会馆的院墙处增开的。后来，大门移至两栋楼之间凹进去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原黄陂会馆的大门。

我1961年看到的双洞门中学的模样，与我保存的1968年武汉红卫中学的照片是一致的，学校大门往东即友谊路方向迁移了十来米，在两栋楼房之间凹进去约5米。进大门后左边有一间传达室，传达室后面即原大门进去

去的院子为花圃，左拐进3层的教学楼。那时教学楼较新，我们的教室在3楼，大约是拆除黄陂会馆的部分建筑后所建。大门右边的房子为江汉区教师宿舍，我在民主街小学读书时的数学周老师（女）住在这栋楼。

学校大门当为原黄陂会馆大门改扩建。“中共五大会址”木牌原在语录处。《大路朝天——穿越汉口中山大道》一书引用了武汉文史专家蓝蔚先生的一段话：“黄陂会馆是‘五大’汉口会场的事实，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过确认。当时在武汉召开文物方面的会议时，有位‘五大’代表曾是个纱厂女工，她谈到会址在汉口黄陂会馆。我们去调



1961年，武汉双洞门中学



1968年11月，武汉红卫中学66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前合影

查核实后，确定它为市级文保单位。我经手做了一个木头牌子，上面写红字，刷桐油，注明这里是中共五大会址。”这个牌子，当是我1961年见过的木牌。1964年秋我读初二时，从万松园中学集体转到双洞门中学，这个木牌没有了。

蓝蔚先生所说的纱厂女工系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的张金保，《张金保回忆录》详细回忆了开会经过：

“我是五大代表，比其他代表迟一天到会，原因是把人通知错了。武汉第一纱厂有一个男工人，与我同名同姓，也叫张金保，也是共产党员，我俩又同在工人武装训练班（注：在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学习。五大开幕的前两天，错把开会通知送给这个男张金保了。直到五大开幕那天，他去大会报到时，大会秘书处才发现搞错了，才在第二天通知我去开会。

大会的开幕式是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的，第二天改在汉口济生三马路的黄陂同乡会馆（今双洞门中学）继续进行。我记得会场上布置得很简单，只贴了‘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大会共开了半个月，是公开举行的。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罗章龙、李维汉、顾顺章、向忠发等都坐在主席台上。

我也被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时，我虽然做了一些基层工作，但只有初步的革命知识和觉悟，深深感到参加大会主席团不够条件，坐在主席台上，心里总是局促不安。有一天，轮到我当大会执行主席，要我主持当天的会议，我怕完不成任务就推辞了。但是，到了闭幕那天，大会决定非要我当执行主席不行。坐在我后面的一位主席团成员（名字记不起了）和坐在我身边不远的李维汉同志，见到我很为难，就主动帮助我，才算完成了任务，使大会顺利地闭幕。”

张金保是日商泰安纱厂的女工。泰安纱厂在原硚口玉带门西边，京汉铁路在这里有玉带门火车站，川汉铁路以此为起点往西修建了一段，滨临汉水交通方便，因而有宗关水厂、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胜新面粉厂等新型工厂，成为产业工人聚集之



五大开幕式会场

地。中共中央委员中少有无产阶级工人委员，女委员更甚，张金保进入主席团有两重身份——纱厂工人和妇女代表。

这张照片的会场上有孙中山像，张金保坐在主席台，笔者认为是在黄陂会馆开会时的照片，很有可能是闭幕式照片。

1. 张金保没有出席开幕式，张金保的“耙耙头”在参加工人武装训练班时剪为短发，张金保参加并主持的是闭幕式；

2. 郑超麟言会场“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照片中有孙中山像；

3. 黄陂会馆为两层楼建筑，一楼的房间才有天花板。

其实，武昌开幕式的照片还有一张。2024年5月16日，武昌辛亥革命博物院“文献藏品中英雄的武汉”展出了一张“中共五大会议内场照片”，放在橱窗里，我拍了照片，但有反光效果不好。后来，在湖北省图书馆原研究馆员昌庆旭的手机里看到此照。从屋顶结构可以看出，这张照片也是在武昌一小拍摄的。

关于五大开幕的时间问题，也有两条史料值得关注。

一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的照片上，有瞿秋白的题字：青天白日中山装，赤色大会已是五回！最可纪念的一日，一九二七、四、二八，武昌第一小学。开幕式当天，瞿秋白夫妇在这里拍照留念。那时长江上没有大桥，会议代表大多住在汉口，往来坐轮渡不方便，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也住在汉口。

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代表（团长）罗易（印度人），4月30日在五



瞿秋白与杨之华

大上作了以《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为题的长篇讲话（《武汉国民政府史料》P276）。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七、罗易与中共五大”（第420—431页）中，有《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书作者A.B.巴库林（苏联人）5月12日根据罗易报告做的笔记，“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当前的一件大事”，明确记载“代表大会是在4月28日开幕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唯有五大在武汉举行，是我们城市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值得开掘的宝贵旅游资源。武昌都府堤“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庄严隆重，汉口济生三马路（自治街）则没有任何标记。一大在上海开幕，在浙江嘉兴南湖船上闭幕，两处都有纪念馆。五大在武昌一小开幕，在汉口黄陂会馆闭幕，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建两个纪念馆呢？

田联申，武汉市交通科学研究所退休干部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二）

◇ 刘宝森

北伐到武汉的航空处

1920年，孙中山在广东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年底成立航空局，任朱卓文为局长，直属于大元帅府。局辖两个航空队，张惠长为第一队队长，有水上飞机3架；陈应全为第二队队长，有陆上飞机两架。1923年，以杨仙逸为局长，队长改由黄光锐、林伟成接充。其后，杨仙逸参战殉职，黄秉衡代理局长，不久陈友仁为局长。1925年，张治中为局长，陈秀、蔡司渡为队长。

航空局派陈卓林、林伟成去苏联，购回“地海威伦”型飞机6架、“空克斯”型飞机1架、“爱佛楼”型飞机1架。航空局扩大，设军事、航政、总务3处。林伟成出任军事处兼总务处处长，张静愚为航政处处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航空局改为航空处，林伟成为处长，陈卓林为队长，张静愚为党代表，直属总司令部。

抵武汉后，由党代表张静愚代理航空处处长，原有的飞行人员多已回粤。航空处有一位朝鲜籍飞行员金治轩（又名金治珩、金治汉），1924年9月结业于东京伊藤飞机制作所，获得三级飞行员资格证书，来中国广东投效革命，随空军参加北伐进驻武汉。

航空处改组后，张静愚罗致北方飞行人员。南苑航校3期的胡百锡，4期的李锡哲、李锡圭、严瑶圃、石宗翰、晏长祐、李云鹏等与李大钊联系，经介绍到武汉航空处为飞行员。张静愚听说曹宝清、欧阳璋、高在田由绥远回到北京，派严瑶圃赴京，邀约3人到武汉航空处。曹宝清了解到飞机只有3架、飞行人员已有10人，商量由高在田先来，俟飞机多时二人再来。12月，高在田到武汉航空处，委任为飞机队队长。

1927年1月底，高在田寄信曹宝清，转达张静愚希望他们二人早到汉。2月中旬，二人抵达武昌，曹宝清为飞机总队队长，欧阳璋为总队副队长兼飞机第二队队长，高在



北伐战争中的“中山号”飞机

田为第一队队长。正值国共合作时期，飞行、机械人员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大家相处很好，每天在武昌南湖练习飞行，只是飞机太少练习不充分。3月24日，收复南京的消息传到武汉，曹宝清即向张静愚建议，孙传芳原在南京设有江浙闽皖赣五省联军航空司令部，下辖两个飞机队，队长张维、耿煜是南苑航空学校3期毕业生，与曹和欧阳同期，与高在田也很熟，最好派欧阳和高前往南京接收。张即安排二人前往。曹宝清设想，飞机接收后合编为两三个飞机队，分驻南京、武汉两地。不料时局突然发生变化，张静愚以去南京接收飞机为由离开武汉，带走航空处部分人员。

随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更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处，所属飞机队更名为飞机总队。南湖誓师大会后，唐生智、邓演达等率部沿京汉线向河南进军，与奉军作战。飞机亦由南湖机场飞赴奉方侦察，协同作战。

张静愚走后，军事委员会即派俞域西为副处长。5月初，由孙科兼任处长，他召见所有飞行人员，一一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经历等，过几天即发表一份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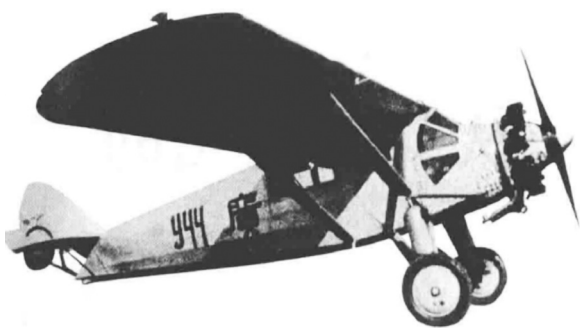
“兹派曹宝清、高在田、胡百锡赴宁、沪、京、津等地联络航空人员，每人发给差旅费五百元。”同时，任命陈秀为飞机总队总队长。曹、高等人便辗转抵达南京。

蒋介石下野，由桂系操纵成立特别委员会，在武汉的唐生智以反对特委会为名，派何键、刘兴等部沿长江两岸进至安庆、芜湖，威胁南京。10月20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任李宗仁率第七军等部为西征军总司令。第七军配有水上飞机一队，队长刘国祯，由副队长曹宝清率领沿长江西征，配有德制“容克斯”（又称“水容克”）1架、“施来克”（又称“徐勒克”）2架，沿江散发传单或侦察。11月2日，“容克斯”飞赴武汉散发传单时，落于江中后受损。不到一个月时间，唐生智部败退，曹宝清随李宗仁所乘舰船到达汉口，接收武汉航空处及飞机队所属“地海威伦”2架、“爱佛楼”1架，连同水机一队，成立第四集团军航空处。张维为处长，胡百锡、葛世平为科长，杨鹤霄为队长，新购“莱茵”4架。这时，李宗仁航空力量最为强大。

1928年2月，北伐军航空司令部成立，以张静愚为司令、蒋逵为参谋长。第四集团军航空处以刘雨轩为队长参加北伐，7月抵北平。1929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李宗仁倒蒋失败，李宗仁在武汉的飞机和人员，全部被南京收编。

“广州号”“珠江号”经停武汉

1928年，“广州号”“珠江号”长途飞行经停武汉，三镇为之振奋，其过程可见中国航空的曲折发展。



“广州号”进行第一次全国长途飞行

张惠长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大环乡，幼年随父侨居美国。1914年，孙中山派林森赴美招募华侨子弟学习航空，张惠长获选，在加利福尼亚红木城学习航空。1915年，转送纽约附近的寇狄提罗（又译寇提斯）航空学校第一期华侨飞行班。

1917年夏，张惠长毕业后随孙中山回国。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张惠长为侍从副官。1918年，军政府设立航空处，李一铿为处长，张惠长为副处长，二人将美国华侨带回国的两架飞机部件安装修理，试飞成功后开始培训飞行员。随后，孙中山命令飞机配合援闽粤军开赴福建，两架飞机先后坠毁或损坏。

1920年春，孙中山派张惠长、陈庆云至澳门，向法商接洽购买6架水上飞机事宜。因一时未将款项筹到，只有澳门富商捐献1架，陈炯明派人购得1架。张、陈二人便成立飞机队，先后以澳门水域、珠江口三灶岛作为训练基地。9月中旬，6架飞机购齐，雇用两名美国飞行员，飞机队迁入虎门，准备袭击广西军阀莫荣新控制的广州。26日晚，张惠长等驾驶两架飞机，对设在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府投下3颗炸弹并散发传单。时值中秋赏月之夜，莫荣新部迎来从未见过的炸弹人心惶惶，加上回师粤军逼近广州，次



“广州号”飞机在天津机场

日仓皇撤出广州。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投入作战、第一次投掷炸弹，载于史册。

孙中山回粤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张惠长为航空局副局长。10月初，张惠长与两名美国飞行员飞往肇庆一带侦察敌情，因飞得过远消耗油量，不得已降落在德庆西江沙滩上。张惠长与一名美国飞行员得乡民救助脱险，另一名美国飞行员失踪，飞机成为桂军战利品。

1922年春，飞机队重新改组，10余架水上飞机留粤，陆上飞机编为北伐军飞机队，由张惠长任队长、陈庆云为副队长，归北伐军右路军总指挥许崇智指挥。张惠长率队进驻韶关，配合陆军由南雄向江西信丰、赣州、吉安等地挺进。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召北伐军回师靖乱。张惠长带领飞机队随许崇智部急回广东，在韶关大塘等地对来堵截的叛军猛烈轰炸。但由于飞机汽油无处接济，许部又遭遇前后夹攻呈不支之状，为了飞机不落于叛军手中，将4架飞机焚毁于始兴县多塘铺机场。张惠长撤离后转至上海，在上海闲居4年。

1926年7月，广东的飞机及人员大都随军北进。1927年初，留下的飞机及人员改归第8路军李济深指挥。5月，张惠长应

李济深电邀抵粤，6月30日就任航空学校校长之职。1928年3月26日，张惠长购进一批训练飞机及战斗机，成立飞机队。1929年3月，成立第二飞机队及飞机修理厂。

1927年5月，美国飞行员林白驾机自纽约直飞巴黎成功，张惠长萌生环飞全国的念头，借以宣传、推动航空事业。他以广东航空救国同志会总会的名义，向美国莱茵飞机厂订购两架客机，考虑国内纷争不断以免误会。

1928年夏，两架飞机运抵广州，试飞成功后拟定飞行计划。一架陆上飞机命名为“广州号”，拟飞汉口、南京、上海、北京、天津、沈阳；一架水上飞机命名为“珠江号”，拟飞梧州、长沙、汉口、上海、宁波。选择这几个城市，源于均已开辟机场，影响也最大。

两驾飞机机身木架用帆布围成，两翼亦为木布结构。马力200匹，总重量3300磅，发动机有9个气盘。飞行距离700英里，最快时速每小时126里。飞行高度16000尺。

11月11日上午，张惠长偕同飞行员黄毓沛、杨官宇和机械师杨标，驾驶“广州号”自广州大沙头机场起飞，6小时后抵达汉口。无论是时速还是距离，均创国内新纪录。15日由汉口飞南京，20日由南京飞北平，26日由北平飞沈阳，12月1日由沈阳回飞天津，4日由天津飞上海，18日由上海飞广州，航程约5600公里。

“珠江号”由陈庆云偕第一飞机队队长黄光锐、航校校长周宝衡驾驶，机械师梁庆铨随机。12月1日自广州大沙头机场起飞，至汕头后沿海岸线向东北飞行，途经福州、宁波、杭州至上海。11日由上海沿长江西飞，途经南京、南昌、九江至武汉，南下经长沙、衡阳、梧州等地，30日飞返广州，航程约

4400多公里。

“广州号”“珠江号”长途飞行，跨越12个省区，航行1万公里，是中国首次长途飞行，引起全国关注。飞机每到一个城市，均受到上自军政要员、下至平民百姓的热烈欢迎。当时，各地机场设施十分简陋，陆空之间没有无线电讯，更没有导航设备。张惠长、陈庆云一行，仅凭飞机上的罗盘和目测校正航向。飞行途中，多次遇到暴风雨、大风雪和浓云重雾等恶劣天气而迫降，但开拓前行终获成功。

“广州号”“珠江号”经停武汉是为盛事，全国各大报纸均发消息，张惠长一夜成为新闻人物，誉为“中国的林白”。“珠江号”飞抵武汉，《申报》报道说：“汉口，珠江号飞机二十午后一时二十分抵武昌南湖，欢迎代表数百人。该机中止北行，定二十二飞赴长沙、桂林、梧州返粤。”

参考文献：

- [1] 戚厚杰等：《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 蒋遼：《旧中国航空界见闻》，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 [3] 曹宝清，《宁汉分裂和宁汉合作时期的航空》，党德信总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东征北伐3》，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

刘宝森，武汉公交集团退休干部

武汉新区“六湖连通”构建生态水网

◇ 吴世纬

武汉汉阳地区自古湖汉纵横江湖连通，2300多年前乐师伯牙顺河而下，得逢知音钟子期。我孩童时从武汉回老家汉阳县蓼山，没有陆路交通，就是乘坐汽划子走水路。在墨水湖的马沧湖上船，沿着连通的港、渠、河、湖划行，水草丰茂，雁鸥云集。船行水上，边吃甘蔗边看风景，吃一根甘蔗的时间就到了后官湖的码头。上岸后，翻过一座小山，就到了蓼山汪湾，正好赶上吃中饭。

时序更替，城市扩张，汉阳地区慢慢水系分割、港汉堵塞、水域萎缩，转眼到了需要全面治理的时候。

2002年4月，武汉启动碧水蓝天行动计划，武汉规划设计院拿出《六湖动态水网景观生态规划》，目标概括为六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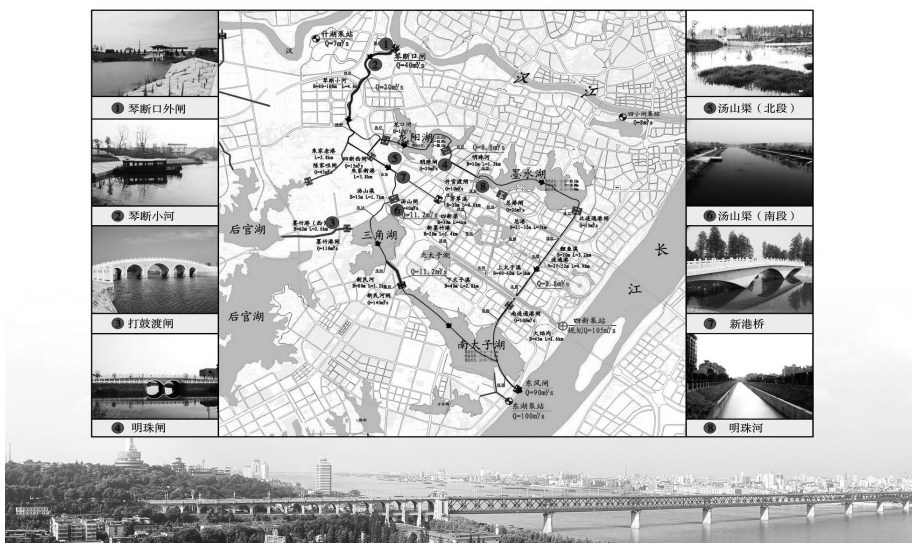
“活”——联江河通六湖，形成动态水网；
“净”——切实控制污染，实现水质达标；
“文”——激活城市记忆，彰显文化内涵；
“秀”——塑造湖光山色，展现丽水景观；
“游”——发展生态旅游，打造城市名片；
“益”——创造宜居环境，提升城市功能。

这一规划，为重走当年伯牙、子期的“知音之路”，铺设了新的画卷。

2005年初，武汉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设立六湖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我被聘请为办公室技术顾问。

六湖连通工程为“二江六湖十二渠”，包括长江、汉江两江；龙阳湖、墨水湖、南太子湖、北太子湖、三角湖、后官湖六湖；琴断口小河、朱家老港、朱家新港、龙口渠、

汉阳六湖连通工程示意图



连通港、新民河、打鼓渡河及新建明珠河、汤山渠、龙新渠、上太子溪、下太子溪十二渠，形成生态水网。工程总投资约 19 亿元，根据建设资金来源分三部分实施：一是“武汉水专项”配套工程；二是“武汉新区六湖水系网络工程”；三是“武汉新区湖渠整治工程”。历时 9 年，2013 年底全部完成。

六湖得名有传说

龙阳湖地处武汉西南端，东临长江，北依汉水，南邻沌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 1.9km²。龙阳湖畔的龙阳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高龙的传说故事。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春节时舞高龙以祭祀。或许，龙阳湖这个名字，也是由“高龙之舞”衍生而来。

墨水湖位于汉阳中东部，东临马沧湖南路，西靠龙阳大道，北为墨水湖北路，南连鲤鱼湖，总面积 4.8km²。传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昭明太子住在湖边著其《昭明文选》，笔墨致湖水染色而得名。

南太子湖位于汉阳东南，湖水面积 6.58km²。北太子湖东邻江堤乡，与南太子湖以中环线相隔，西邻龙阳大道，北抵鲤鱼洲，湖水面积 0.51km²。二者原为太子湖，民间传说一皇后在湖上渔船产子而得名。太子湖又称灌子湖，因长江水倒灌入湖故称。

后官湖与三角湖均毗邻沌口经济开

发区。后官湖湖水面积 34.4km²，三角湖湖水面积 2.35km²。传说姜子牙青年时文武双全，47 岁那年家乡三年不雨，背着母亲一边乞讨一边寻找水乡之地，终于在一处湖边居住下来。姜子牙虽然穷苦，但仍然行善不止感动了神仙，受指引而进宫廷——这就是后官湖的来历。

六湖原本相连贯通，由于城市不断发展，湖泊面积逐渐缩小，港、渠、河堵塞，调蓄功能也急剧下降。为此，着眼于“以水治水，引江入湖”，借助长江、汉江治水，以动治静，以清释污，以丰补枯，实现江湖连动、六湖回归。

生态修复第一位

在湖泊全面实现截污的基础上，通过新建和改造港、渠、河，利用水力调度手段将湖泊连通；通过清污种植水生植物，建设人工湿地等，逐步恢复生物多样性，提高湖泊自净功能，提升湖泊水质，辅以湖岸生态



生态护坡

景观建设，最终实现水质全面改善的目的。

在湖泊修复中，岸边以沉水植物、挺水植物为主，结合漂浮植物建立水生植被系统。墨水湖疏浚污泥 42.28 万 m^3 ，建造人工湿地 3 处，恢复水生植被 154.2 万 m^2 ；龙阳湖底泥疏浚 25 万 m^3 ，造人工湿地 2 处，恢复水生植被 57.9 万 m^2 ；南太子湖疏浚底泥 25 万 m^3 ，建改人工湿地 1 处，恢复水生植被 137.3 万 m^2 ；北太子湖底泥疏浚 2.49 万 m^3 ；三角湖建造人工湿地 2 处，占地 1.17 万 m^2 。

除后官湖外，我们在五湖完成恢复面积 107.9 万 m^2 ，其中挺水植物 38.5 万 m^2 、浮叶植物 10.6 万 m^2 ，沉水植物 58.5 万 m^2 。新建人工湿地 6 处，总面积为 74320 m^2 。恢复水生植被 383.9 m^2 ，布设人工浮床 4 处，总面积为 26.64 万 m^2 。

以三角湖为例，三角湖湖泊面积为 2.35 km^2 ，湖水面积为 15.7 km^2 ，平均水深

1.9m。在三角湖造人工湿地 2 处，一处位于江汉大学行政楼东北角的湖滨小岛，占地面积 1500 m^2 ，处理水量为 1200T/天；一处位于北面湖汊，占地面积 7000 m^2 ，处理水量为 5600T/天。在西南、西北湖湾和东部水域恢复以沉水植物为主、挺水植物为辅、结合少量漂浮植物的水生植被，恢复面积为 85.2 万 m^2 ，其中挺水植物 26.3 万 m^2 ，浮叶植物 8 万 m^2 ，沉水植物 50.9 万 m^2 。

湖泊生态的系统修复，湖泊深层次的生态多样性恢复，还需要通过不断地有效治理，最终达到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的目的。

港渠连通活血脉

汉阳过去几乎是明渠排水，随着城市扩张和企业污水排放加剧，明渠改为暗渠甚至阻断，湖泊就成了排水出路。因此必须进行港、河、渠的修复，从而形成水网连通。琴断口小河与汉江相连；南太子湖与长江相连；墨水湖与南太子湖依靠连通港相连；后官湖与三角湖依靠竹叶港西段相连；三角湖与南太子湖依靠新民河相连；后官湖与琴断口小河依靠朱家港相连。

同时，新开挖河渠以有效连通形成水网。为连接龙阳湖与三角湖，新造汤山渠；为连接龙阳湖与墨水湖，新造明珠河；为连接北太子湖与南太子湖，新建上太子溪和下太子溪；为连接龙口渠与朱家新港，新建龙新渠。但无论是修复原 7 条港、河、渠，还是新建 5 条港、河、渠，都必须具有生态净化和景观美化的双重功能。

在整个水网连通工程中，新建 5 条

总长 5.2km；修复 7 条总长 20km；改造琴断口闸引水项目 1 项；新建和改造节制闸 6 座、沉沙池 1 座、交叉构筑物 11 处；新建桥梁 5 座。无论是新建还是修复，也都必须具有生态净化和景观美的双重功能。

对新建港、渠，按设计要求作好生态护坡。在新建长 1400m 的明珠河上，采用直接强化生物接触氧化法及堤岸边坡生态护坡，与港渠内植物生态修复方法进行水体建设。在新建长 2800m 的汤山渠两边堤岸，设有两级步道及适当处亲水平台，并在两岸种植水生植物及陆生植物护坡。在修复长 1100m 的新民河，同样沿两岸种植水生及陆生植物护坡。

琴断口小河与汉江直接连通，由琴断口闸控制。琴断口小河全长 4.8km，宽 80—120m，是我市城市边缘区域难得的生态景观地带。我们设想以永丰堤堤岸为骨架，以流水为血脉，以两岸林木为容颜，加之底蕴浓厚的知音文化为灵魂，使之具备都市生态一日游的旅游资源基础。为此，我们专门打造了琴断口小河的生态修复，沿岸设置观光步道及亭廊，增设旅游船和码头，尽量不破坏原有河道的生态群落，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驳岸类型（如柳条护岸、木桩护岸等）。在河道较宽的地方，增设河中小岛。

同时，我们提出了“一日游”方案，游人来了可看清代的永丰闸、米粮山等人文景观，也可看湿地、水生植物、两岸树林等自然景观，从而观江、垂钓、划船、踏青，享受自然的森林浴。在米粮山讲米粮山的故



琴断口小河生态景观

事，在知音广场讲知音的故事。由此，琴断口小河不仅是“引江济湖”的入口通道，也是旅游观光的一处胜地。

新建、修复的港、渠不仅连通六湖形成水网，并且建成各具特色的风景长廊，值得一走，值得一看。

引江入湖造美景

将长江和汉江之水引入湖泊，在江湖之间形成动态水系，形成生态的、流动的水环，增强湖泊自净能力、改善湖泊水质。利用琴断口小河连通汉江，通过车风闸和车湖泵站连通长江，实现内、外水系的贯通，使静水变动水，修复受损水体。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江湖连通水力调度的实践，来检验连通效果和动态水网形成的状况。为此，我们编制调水方案，成立调水专班，经充分准备后启动水力调度。2005 年 6 月 22 至 24 日调水 3 天，调入汉江水量 150 万 m^3 ，达到了预期目的。



新建打鼓渡闸

一是动态水网初步形成。调水期间形成三组水网：汉江水通过琴断口小河、三角湖、后官湖和南太子湖至长江的水网；后官湖水通过三角湖和南太子湖至长江的水网；墨水湖水通过连通港、三角湖和南太子湖至长江的水网。

二是生态廊道初见成效。调水期间，肉眼可见汉江鱼类随水流入琴断口小河，闸内不时有鱼群跃出水面。据监测，湖、渠在调水后新出现的鱼种类有8种，包括贝氏鲮、副沙鳅、鲢、达氏鲃、似鳊、似鲃、中华刺鲃等。

三是水网水质初步改善。调水后，三角湖总体水质呈上升趋势，大部分水质指标监测值优于调水前。湖泊水质指标变化量，最为明显的是溶解氧，三角湖提高近一倍，水质上升2—3个等级。连通渠道水质指标中，变化最为明显的是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琴断口小河调水后，以上的三个指标均提高3个等级。

同时，在调水过程中，武汉市血防机构在琴断口闸地区未发现钉螺。总体上说，这次调水是成功的，为今后水力调度创造了

有利条件。

武汉六湖连通工程，将城中湖泊连通为一个整体，再与长江、汉江连通，形成一个江湖连通的城市公园形象。

武汉六湖连通工程，体现了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和武汉水水相连、人人亲水、城水相融的理念。现在，这一大片成为宜居的城市花园。原连接墨水湖与南太子湖的连通港，两侧修建了连通港南路和连通港北路，路旁高楼林立，居民小区依水而建。20年后的今天，再到六湖连通工程的地方，我认不出来了，迷路了。

六湖连通虽然只是在汉阳，但其生态价值对于武汉众多江河湖泊水环境的治理，更有特别重要的标本意义。

吴世伟，武汉市水务局原巡视员、高级工程师